

東亞社會發展研究

目 錄

- 1 低生育率背景下女性生育顧慮的社會成因研究
林若楠
- 8 論伍燕翎的“家國書寫觀”——聚焦其著作《寫在家國之內：從馬華文學出發的閱讀
筭記》
李天甲，陳 穎
- 17 文化傳播視域下《哪吒之魔童降世》字幕中文化負載詞的英譯研究
周文強，楊 杰
- 29 綠色消費態度與購買行為脫節的社會成因
姚 慧
- 38 青年“搭子”社交中的關係變遷與情感需求研究
吳 陽

DOI: 10.53104/dyshfzyj.2026.02.02.001

低生育率背景下女性生育顧慮的社會成因研究

林若楠¹

1. 安徽大學，安徽 合肥 230601

摘要：低生育率已經成為當前社會發展中較為突出的結構性問題。與一般意義上的經濟壓力解釋相比，女性生育顧慮的形成更需要放在性別關係、勞動制度和家庭責任分配中理解。現實中，女性在生育過程中不僅承擔身體風險，也更容易承擔育兒、家務和老人照護等長期責任。與此同時，生育還可能影響女性的職業連續性和發展機會，使部分女性在婚育選擇上更加謹慎。本文從社會成因角度出發，分析低生育率背景下女性生育顧慮的形成機制。文章認為，女性生育顧慮並不是單純的個人態度變化，而是生育成本性別化分配、職場母職懲罰、家庭照護責任女性化、母職規範壓力和公共支持不足共同作用的結果。要緩解女性生育顧慮，不能只依靠經濟補貼或生育宣傳，還應從就業保護、托育服務、父親育兒責任和家庭性別平等幾個方面改善生育支持環境。只有降低女性因生育而承受的職業風險和生活壓力，生育選擇才可能回到更安全、更自主的狀態。

關鍵字：低生育率；女性生育顧慮；性別不平等；母職懲罰；家庭照護責任

A Study on the Social Causes of Women's Fertility Concerns in the Context of Low Fertility

LIN Ruo-nan¹

1. Anhui University, Hefei 230601, P. R. China

Correspondence to: LIN Ruo-nan; Email: 2811361978@qq.com

Abstract: Low fertility has become a prominent structural issue in current social development. Compared with explanations that focus mainly on economic pressure, women's fertility concerns need to be understood within gender relations, labour institutions,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family responsibilities. In real life, women not only face the physical risks of pregnancy and childbirth, but are also more likely to take on long-term duties such as childcare, housework, and elderly care. At the same time, childbirth may affect women's career continuity and future opportunities, making some women more cautious about marriage and childbearing decision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causes,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formation of women's fertility concerns under the condition of low fertility. It argues that such concerns are not merely the result of changing individual attitudes. Rather, they are shaped by the gendered distribution of reproductive costs, the motherhood penalty in the workplace, the feminization of family care responsibilities, pressure from maternal norms, and insufficient public support. To reduce women's concerns about childbirth, policy responses should not rely only on financial subsidies or general pro-natalist appeals. More attention should be given to employment protection, childcare services, fathers' participation in childrearing, and gender equality within the family. Only when the occupational risks and everyday pressures associated with childbirth are reduced can fertility choices become safer and more

通信作者：2811361978@qq.com

引用格式：林若楠. 低生育率背景下女性生育顧慮的社會成因研究[J]. 東亞社會發展研究, 2026, 2(2): 1-7.

autonomous for women.

Key words: low fertility; women's fertility concerns; gender inequality; motherhood penalty; family care responsibilities

引言

低生育率已經不只是人口數量變化的問題。出生人口減少背後，牽連著年輕人的婚姻安排、家庭責任、職業選擇和生活預期。根據國家統計局資料，2024 年全年出生人口為 954 萬人，出生率為 6.77‰^[1]；2025 年全年出生人口下降至 792 萬人，出生率為 5.63‰^[2]。這些變化提醒人們，生育問題不能只停留在“是否願意生”的層面理解，也不能簡單看作短期政策刺激能夠解決的問題。

關於低生育率的討論，經濟壓力常常被放在最前面。住房成本、教育支出、托育費用、生活不確定性，都會影響家庭的生育安排。可是，如果只把問題歸結為養育成本過高，就容易忽略女性在生育過程中的特殊處境^[3]。對女性來說，生育並不是家庭人口增加這樣一個單純結果，它還意味著身體負擔、時間投入、職業節奏變化和家庭角色調整。懷孕、分娩和產後恢復由女性直接承擔，孩子出生後的照護、陪伴和教育安排，也往往更多落到女性身上。

女性的生育顧慮並不等於拒絕家庭生活。很多女性在考慮生育時，更在意的是生育以後生活是否還能保持基本穩定。她們會擔心職業發展被打斷，擔心工作機會減少，擔心育兒責任主要由自己承擔，也擔心在家庭和職場之間長期處於拉扯狀態。現實中，女性常常被要求既要承擔母親責任，又不能放鬆職業表現；既要照顧孩子和家庭，又要保持經濟獨立和個人發展。生育選擇就在這些壓力之間變得更加謹慎。

從這個角度看，女性生育顧慮不是單一的個人態度問題，而是許多社會條件共同作用的結果。家庭內部的責任分配、勞動市場對婚育女性的預期、公共托育服務的供給狀況、男性育兒參與程度，都會影響女性對生育風險的判斷。低生育率背景下討論女性生育顧慮，重點

不是追問女性為什麼不願意生，而是要看到生育之後哪些成本被更多地交給女性承擔，哪些支持還沒有真正進入她們的日常生活。

1 生育選擇中的風險感知

在低生育率背景下，女性對生育的猶豫並不是孤立出現的。它往往產生於對未來生活變化的預判之中。生育意味著家庭結構發生變化，也意味著女性的身體狀態、時間安排、職業節奏和家庭角色都可能被重新調整。對不少女性來說，是否生育已經不只是私人願望問題，而是一個需要反復權衡的生活決策。

這種顧慮並不同於否定生育本身。現實中，很多女性並不是完全沒有生育意願，而是擔心生育之後自己需要承擔過多後果。孩子出生以後，生活中的許多安排會隨之改變。原本穩定的工作節奏可能被打斷，原本屬於個人的時間會被壓縮，夫妻之間的責任分配也可能出現新的矛盾。生育帶來的並不是單一變化，而是一連串生活秩序的重組。女性在作出生育選擇之前，往往已經能夠預見這些壓力。

女性的風險感知還來自生育責任的不確定性。一個家庭是否具備穩定的經濟基礎，是否有可靠的托育支持，父親是否能夠真正參與育兒，雙方父母是否能夠提供說明，這些都會影響女性對生育的判斷。問題在於，這些支持並不總是穩定存在。祖輩照護可能受到年齡、健康和居住距離限制，托育服務可能存在費用、品質和時間銜接問題，男性育兒參與也可能停留在短暫陪伴或臨時幫忙層面。在這種情況下，女性會更容易把生育理解為一種需要自己長期承擔的責任。

生育顧慮還與女性對生活自主性的重視有關。隨著受教育水平提高和就業參與增加，越來越多女性希望在家庭生活之外保有穩定的職業身份和個人空間。她們並不是不重視家庭，而是不願意在進入母親角色之後失去原有的發

展可能。生育如果意味著職業發展受限、個人時間消失、家庭勞動增加，那麼女性對生育保持謹慎，就不能簡單解釋為觀念保守或責任意識不足。

這種風險感知也說明，低生育率問題並不能只從生育意願本身尋找答案。女性在生育前看到的並不是一個抽象的孩子，而是孩子出生以後可能隨之到來的職業壓力、照護壓力、經濟壓力和身份壓力。生育選擇變得謹慎，實際上反映出女性對現實條件的理性判斷。只有理解這種判斷的來源，後文關於生育成本、職場壓力和家庭照護責任的分析才有現實基礎。

2 生育成本的性別化分配

低生育率討論中，“養不起”常常被看作最直接的原因。住房、教育、醫療、托育等支出確實會影響家庭的生育安排，但生育成本並不只是家庭帳本上的金錢支出。對女性來說，生育還會帶來身體成本、時間成本、職業成本和情緒成本。這些成本在家庭內部並不是平均分配的，很多時候會沿著既有的性別分工落到女性身上。

懷孕、分娩和產後恢復本身就由女性直接承擔。這個過程不只是醫學意義上的身體變化，也會影響女性的工作節奏和生活安排。孩子出生以後，照護責任很快進入日常生活。餵養、陪伴、接送、輔導、看病、情緒安撫，這些事務往往細碎，卻會長期佔用時間和精力。它們不一定被家庭成員清楚計算，也不一定被社會充分看見，但會實實在在地改變女性的生活結構。

時間利用資料可以較清楚地說明這種差異。國家統計局 2018 年全國時間利用調查顯示，居民家務勞動平均時間為 1 小時 26 分鐘，其中男性為 45 分鐘，女性為 2 小時 6 分鐘。陪伴照料孩子生活的平均時間中，男性為 17 分鐘，女性為 53 分鐘；在 25 至 34 歲群體中，男性為 29 分鐘，女性達到 1 小時 55 分鐘^[4]。這個年齡段正是婚育和職業發展高度重疊的時期，女性在育兒上的時間投入明顯高於男性，意味著生育對女性日常生活的擠壓更為直接。

這些資料並不是要說明男性完全不參與家庭生活，而是提醒人們，家庭內部的勞動分配

仍然存在明顯差異。很多家庭會把父親照看孩子稱為“幫忙”，卻把母親照看孩子視為本分。語言中的差別背後，是責任歸屬的差別。母親承擔育兒勞動時，往往被認為理所當然；父親承擔相同勞動時，卻容易被理解為額外付出。久而久之，女性在生育前就能預見，孩子出生後大量事務可能會自然轉向自己。

生育成本的性別化分配還體現在情緒勞動上。孩子的成長安排、家庭成員之間的溝通、老人對育兒方式的意見、孩子學習和健康問題，很多都需要母親持續協調。相比看得見的家務勞動，情緒勞動更難被量化，也更容易被忽略。女性常常不只是“做了多少事”，還要負責記住哪些事該做、判斷什麼時候做、協調由誰來做。這樣的責任會讓生育從一個家庭選擇變成女性長期管理家庭生活的任務。

女性對生育的顧慮，很大程度上來自對這種成本分配方式的預判。如果生育之後，主要照護責任、家務勞動和情緒勞動都更多集中在女性身上，女性自然會更謹慎地考慮生育。低生育率問題不能只問家庭是否有足夠收入，還要看生育之後誰付出更多時間，誰承受更多職業中斷，誰承擔更多難以被看見的日常勞動。生育成本被性別化分配時，女性的生育顧慮就不是偶然現象，而是對現實分工的直接回應。

3 職業發展中的母職懲罰

女性生育顧慮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來自對職業發展的擔心。對許多女性來說，生育並不是短暫停下工作幾個月那麼簡單。懷孕、產假、哺乳和早期育兒會影響工作連續性，也會改變單位對女性職業穩定性的判斷。女性在生育前擔心的，往往不是某一個具體崗位會不會變化，而是自己在職場中的位置會不會因為生育被重新評價。

這種擔心並非沒有現實基礎。國家統計局發佈的 2024 年《中國婦女發展綱要(2021—2030 年)》統計監測報告顯示，2024 年末，全國女性就業人員為 3.2 億人，占全部就業人員的 43.4%^[5]。女性已經是勞動力市場的重要組成部分，生育對女性職業發展的影響，自然不只是家庭內部問題，也關係到女性勞動權益和社會

公平。《中國婦女發展綱要（2021—2030 年）》也將婦女平等就業和權益保障作為重要內容^[6]。女性既要參與就業，又要承擔更多生育和照護責任，這種雙重位置使她們更容易在婚育階段面對職業壓力。

“母職懲罰”並不一定表現為公開排斥。有研究指出，生育會對女性職業收入和職業發展產生持續影響，這種影響在中國家庭和勞動市場情境中同樣存在^[7-8]。有時它是隱性的，甚至以比較日常的方式出現。女性懷孕後，可能被減少重要工作安排；產假結束後，可能被認為短期內不適合承擔核心任務；孩子年齡較小時，女性又容易被默認不能加班、不能出差、工作投入會下降。即使這些判斷沒有被明說，也會影響崗位分配、晉升機會和薪酬增長。女性一旦成為母親，原來的工作能力可能沒有下降，但外界對她的職業期待已經發生變化。

更值得注意的是，母職懲罰並不只發生在已經生育的女性身上。未婚未育女性也可能提前承受這種壓力。用人單位在招聘和用工過程中，可能會把女性的婚育狀況看作潛在風險。2019 年人社部、教育部等九部門曾聯合發佈通知，明確要求招聘時不得詢問婦女婚育情況，不得將妊娠測試作為入職體檢項目，也不得將限制生育作為錄用條件^[9]。這類規定的出臺，恰好說明婚育因素曾經在女性就業過程中形成過現實障礙。法律和政策可以禁止明顯歧視，但一些隱性預期仍可能存在於招聘、考核和晉升環節中。

在這樣的職場環境中，女性對生育的謹慎就很容易理解。她們擔心的不是單純的產假損失，而是職業發展節奏被打斷之後，能否重新回到原有軌道。尤其是受教育程度較高、職業規劃較明確的女性，往往已經在求學和就業中投入了大量時間和精力。生育如果意味著晉升機會減少、職業評價下降、崗位邊緣化，女性就會把生育看作一種長期風險，而不是短期安排。

母職懲罰還會改變女性對家庭分工的判斷。如果職場默認母親會更多照顧家庭，家庭內部又默認母親應當更多照顧孩子，女性就會同時被兩套邏輯約束。在單位裡，她可能因為母親身份被認為工作投入不足；在家庭裡，她又可能因為工作投入較多被認為照護不夠。兩

邊都要求女性承擔責任，卻都沒有完全承認女性承受的壓力。生育顧慮就在這種雙重期待中不斷加深。

緩解這一問題，不能只要求女性提高平衡能力。真正需要改變的是勞動市場對婚育女性的預設，以及生育成本在企業、家庭和社會之間的分擔方式。女性不應因為生育而被視為不穩定勞動力，也不應在成為母親之後被迫降低職業期待。低生育率背景下討論女性生育顧慮，必須看到母職懲罰對女性職業安全感的影響。只有當女性能夠相信生育不會明顯削弱自己的職業位置，她們才可能在生育選擇上獲得更基本的安全感。

4 家庭照護責任的女性化累積

生育顧慮並不只來自孩子出生後的短期照料。對女性來說，更容易形成壓力的是照護責任會在家庭生活中不斷累積。孩子年幼時需要餵養、陪伴和照看，進入學齡階段後又會出現接送、輔導、溝通學校事務等新任務。與此同時，家庭中的老人照護、日常家務和親屬關係維繫也不會自然減少。很多女性面對的不是某一種責任，而是幾種責任疊在一起後的長期負擔。

家庭照護責任之所以容易向女性集中，和傳統性別分工的慣性有關。在不少家庭中，母親被默認更細心、更適合照顧孩子，也更應該理解孩子的情緒和學習狀況。父親參與育兒常常被視為值得肯定的表現，母親承擔同樣的事務卻很少被特別看見。久而久之，家庭成員會把許多照護事務自然交給女性處理。孩子發燒誰請假，學校通知誰回復，輔導班誰聯繫，老人身體不適誰協調就醫，這些事情看似零散，卻會逐漸形成一種穩定的責任結構。

這種責任結構還有一個特點，就是它常常發生在日常生活的細節裡，不容易被清楚計算。做飯、洗衣、收拾房間這些家務可以被看見，但家庭照護中還有大量“記住”和“安排”的工作。誰需要買什麼，孩子什麼時候體檢，老人藥還剩多少，學校活動要準備什麼，家庭成員之間的情緒如何協調，這些事務不一定佔據整塊時間，卻會持續佔用注意力。女性在家庭中承

擔的不只是具體勞動，也包括維持家庭正常運轉的管理責任。

相關研究對這種差異有較明確的呈現。這種差異在時間利用資料中也有體現。國家統計局 2018 年全國時間利用調查顯示，女性家務勞動時間明顯高於男性，陪伴照料孩子生活的時間也高於男性。尤其在 25 至 34 歲群體中，女性照料孩子生活的平均時間達到 1 小時 55 分鐘，明顯高於男性的 29 分鐘^[4]。資料背後反映的不是簡單的時間差，而是家庭責任長期分配不均的現實。資料背後反映的不是簡單的時間差，而是家庭責任長期分配不均的現實。女性在婚育之後所增加的勞動，並沒有完全轉化為社會認可，也很少被納入家庭決策中的成本考量。

照護責任的女性化還會受到代際關係的影響。現實中，很多年輕家庭依賴祖輩幫忙照看孩子，但這種支持並不穩定。祖輩照護受身體狀況、居住距離、家庭關係和育兒觀念影響。即使祖輩能夠幫忙，具體協調工作也常常由女性承擔。母親既要照顧孩子，也要處理與上一代之間的育兒分歧。她需要在老人經驗、丈夫意見、孩子需求和自己的工作安排之間不斷調整。表面上看，家庭裡有多人參與照護，實際的組織責任仍可能落到女性身上。

老人照護也會進一步加重這種累積。隨著家庭規模縮小，子女數量減少，中青年女性在照顧孩子的同時，也可能面對父母或公婆的健康照護問題。育兒責任和養老責任在同一階段疊加，會使女性的家庭角色更加沉重。低生育率背景下，很多女性並不是只考慮“要不要生一個孩子”，還會考慮未來幾年甚至十幾年裡，自己是否有能力同時承擔工作、育兒和養老。這個判斷並不輕鬆。

家庭照護責任的女性化累積，使生育不再只是一個階段性事件，而變成一種長期生活安排。女性在生育前看到的，不只是孩子出生那一刻的支出和照料，而是之後持續展開的家庭勞動。只要家庭內部仍然默認女性是主要照護者，女性就很難把生育理解為夫妻共同承擔的責任。她們對生育保持謹慎，恰恰說明家庭照護分工已經成為影響生育選擇的重要社會條件。

5 母職規範與女性主體意識的張力

女性生育顧慮還來自社會文化層面的壓力。生育並不是一個完全私人化的決定，它常常被放在家庭延續、女性角色和社會評價之中。女性到了某個年齡，是否結婚、是否生育、什麼時候生育，都會受到來自家庭親屬、熟人關係和公共輿論的關注。表面上看，這些關注只是普通生活中的意見，實際上卻會不斷提醒女性，生育仍然被視為女性人生中的重要責任。

傳統母職規範對女性的要求並不低。女性成為母親以後，社會往往期待她們自然地承擔更多照護責任。孩子的飲食、健康、學習、情緒、習慣養成，都容易被歸入母親責任範圍。母親如果投入很多時間照顧孩子，常被認為理所當然；如果因工作原因減少陪伴，又可能被評價為不夠盡責。這樣的評價並不一定以激烈方式出現，更多時候隱藏在日常語言裡。比如孩子生病時，人們更容易問母親怎麼照顧的；孩子學習退步時，也常常先追問母親是否管得不夠。這種責任歸因會讓女性在生育之前就意識到，母親身份並不是單純增加一種親密關係，也意味著持續的道德壓力。

問題的複雜之處在於，現代女性的主體意識已經發生明顯變化。越來越多女性接受過較高教育，也有較強的就業參與和個人發展意願。她們希望擁有穩定收入、職業成長和相對獨立的生活空間。家庭對她們來說仍然重要，但不再是唯一的人生安排。女性不再願意把個人發展完全讓位於家庭角色，也不願意把母親身份看作衡量自身價值的唯一標準。生育顧慮在這裡就不只是外部壓力造成的，也是女性重新衡量自我生活邊界的結果。

母職規範和主體意識之間的矛盾，常常表現為雙重要求。社會既希望女性生育，又希望女性在生育後成為高投入母親；既期待女性在家庭中承擔主要照護責任，又要求她們在職場保持競爭力和經濟獨立。女性如果選擇推遲生育，容易被說成太重視自我；如果生育後將更多時間投入家庭，又可能面臨職業發展停滯；如果生育後繼續追求事業，又可能被質疑沒有把孩子放在首位。不同評價之間並不一致，卻共同落到女性身上。

這種矛盾會加重女性對生育後生活失控的擔心。她們擔心的不是單純“辛苦”，而是擔心自己被固定在某種角色之中。母親身份一旦被賦予過多道德要求，女性就很難在家庭、工作和自我之間保持平衡。很多女性在生育前已經能夠看到這種處境：生育不是完成一個家庭計劃，而是進入一套更嚴格的角色評價體系。她們需要證明自己是好母親，也需要證明自己沒有放棄工作，還需要維持家庭關係的穩定。這種持續證明本身就是一種壓力。

女性主體意識的增強並不意味著家庭觀念消失。更準確地說，女性開始要求家庭責任有更公平的分配，也希望生育選擇建立在可承受的生活條件之上。她們並不是拒絕成為母親，而是不願意在缺乏支持的情況下被要求成為“無所不能的母親”。當社會仍然用傳統標準評價母親，卻沒有給女性足夠的制度支持和家庭協作時，生育自然會被看作高風險選擇。

母職規範帶來的壓力往往比經濟成本更隱蔽。經濟支出可以被計算，托育費用可以被比較，職業損失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被觀察。但社會評價和角色期待更容易滲入日常生活，使女性在選擇之前就感到負擔。低生育率背景下，女性生育顧慮的出現，也是在提醒社會重新理解母親角色。母親不應被看作天然的主要照護者，女性的個人發展也不應在生育之後被自動放到次要位置。只有當母職不再被過度道德化，女性才可能在更寬鬆的環境中考慮生育。

6 結語

低生育率背景下，女性生育顧慮的形成並不是單一原因造成的。經濟壓力確實會影響家庭的生育安排，但它只是問題的一部分。對女性來說，生育還意味著身體負擔、職業節奏變化、家庭照護責任增加和社會角色評價加重。許多顧慮並不是在生育之後才出現，而是在女性進入婚育階段之前就已經形成。她們對未來生活的判斷，往往來自對現實分工和制度環境的觀察。

從前文分析可以看到，生育成本在家庭內

部並沒有被均等承擔。女性不僅承擔懷孕、分娩和產後恢復帶來的直接成本，也更容易在孩子出生後承擔日常照護、家務管理和情緒協調等長期勞動。勞動市場中的母職懲罰又使生育和職業發展之間形成緊張關係。女性一旦成為母親，可能會被重新評價為不夠穩定、不便承擔重要任務，甚至在晉升和崗位安排中受到隱性影響。家庭中的照護責任繼續向女性集中，社會文化中的母職規範又進一步提高了對女性的要求。幾種壓力疊加在一起，女性對生育保持謹慎就不難理解。

低生育率治理不能只停留在鼓勵生育的層面。2025 年《育兒補貼制度實施方案》提出建立育兒補貼制度，能夠在一定程度上減輕家庭直接養育支出^[10]。但單純強調生育價值，或者通過經濟補貼降低部分育兒支出，都很難完全回應女性的實際顧慮。女性真正擔心的，不只是孩子出生時需要花多少錢，也包括生育後是否還能保持職業安全，家庭責任是否能夠公平分擔，公共托育服務是否真正可及，社會是否允許母親擁有相對完整的個人生活。生育支持政策如果忽視這些問題，就可能把低生育率壓力再次轉移到女性身上。

緩解女性生育顧慮，需要把性別平等放進生育支持體系之中。就業保護應減少婚育因素對女性職業發展的影響，托育服務應減輕家庭內部的照護壓力，父親育兒責任也需要從觀念宣傳轉向更穩定的制度安排。家庭內部同樣需要改變“母親主要負責、父親適當幫忙”的分工方式。生育本來是家庭和社會共同面對的事務，不應長期變成女性個人承擔的責任。

女性生育顧慮的出現，提醒人們重新理解低生育率問題。它不是簡單的生育意願下降，也不是女性個人選擇的孤立變化，而是社會結構、性別分工和公共支持不足共同作用後的結果。只有當女性不再因為生育承受過高的職業風險、家庭勞動和道德評價壓力，生育選擇才可能擁有更穩定的現實基礎。

參考文獻：

- [1] 國家統計局. 中華人民共和國2024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EB/OL]. 2025-02-28.
- [2] 國家統計局. 中華人民共和國2025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EB/OL]. 2026-02-28.
- [3] 計迎春, 鄭真真. 社會性別和發展視角下的中國低生育率[J]. 中國社會科學, 2018(8): 143-161.
- [4] 國家統計局. 2018年全國時間利用調查公報[EB/OL]. 2019-01-25.
- [5] 國家統計局. 2024年《中國婦女發展綱要（2021—2030年）》統計監測報告[EB/OL]. 2025-12-30.
- [6] 國務院. 中國婦女發展綱要（2021—2030年）[EB/OL]. 2021-09-27.
- [7] Meng L, Zhang Y, Zou B. The Motherhood Penalty in China: Magnitudes, Trends, and the Role of Grandparenting[J].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2023, 51(1): 105-132. DOI: 10.1016/j.jce.2022.10.005.
- [8] Mu Z, Xie Y. “Motherhood Penalty” and “Fatherhood Premium” ? Fertility Effects on Parents in China[J]. Demographic Research, 2016, 35: 1373-1410. DOI: 10.4054/DemRes.2016.35.47.
- [9] 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教育部等九部門. 關於進一步規範招聘行為促進婦女就業的通知：人社部發〔2019〕17號[EB/OL]. 2019-02-21.
- [10] 中共中央辦公廳, 國務院辦公廳. 育兒補貼制度實施方案[EB/OL]. 2025-07-28.

版權聲明

© 2026 作者版權所有。本文依據“知識共享署名 4.0 國際許可協議”（CC BY 4.0）以開放獲取方式發布。該許可允許使用者在任何媒介中自由使用、複製、傳播與改編文章（含商業用途），惟須明確署名原作者及出處，並注明所作修改（如有）。完整協議詳見：<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deed.zh-hans>

出版聲明

所有出版物中的陳述、觀點及資料僅代表作者及供稿者個人立場，與 Brilliance Publishing Limited 及/或編輯人員無關。Brilliance Publishing Limited 及/或編輯人員對因內容所提及的任何理念、方法、說明或產品所導致的人身或財產損害概不負責。

DOI: 10.53104/dyshfzyj.2026.02.02.002

論伍燕翎的“家國書寫觀”——聚焦其著作《寫在家國之內：從馬華文學出發的閱讀笱記》

李天甲¹，陳穎¹

1. 馬來亞大學 中文系，馬來西亞 吉隆坡 50603

摘要：《寫在家國之內：從馬華文學出發的閱讀笱記》是馬華學者兼作家伍燕翎以“閱讀笱記”為體裁結集的隨筆散文集。它既非單純的讀書感悟，也並非傳統的史料考證，而是一種在個人經驗、文學史意識與公共文化立場之間穿梭的“家國書寫”。本文採取文本細讀法，討論該書如何在笱記式書寫中將“家”與“國”之間的張力轉化為可感的閱讀倫理與學術姿態。

在這本書中伍燕翎的“家國書寫”呈現出三重邏輯：其一，通過“大學青春文學啟蒙”的跨語際閱讀，在域外文本的“他者”視域中反觀本土，建立起“家”的情感；其二，通過對馬華史料的鉤沉、作家譜系的整合與馬來西亞華人族群記憶的重構，將“國”從宏大的政治概念落實為馬華文學內部的歷史責任與華社文化共同體想像；其三，以當代馬來西亞華教命運、知識生產與馬華文學的自我省視，將“家國”進一步轉譯為面向華人社群的公共文化實踐。本文通過分析伍燕翎獨特的“家國書寫觀”，深入了解其如何使閱讀成為一種面向華社本土的文化行動，並為馬華文學的自我敘述與身份重構提供有效路徑。

關鍵字：伍燕翎；馬華文學；家國書寫觀；華教

Ng Yean Leng's Conception of Home-and-Nation Writing: A Study of *Writing Within Home and Nation: Reading Not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laysian Chinese Literature*

LI Tian-jia¹, CHEN Ying¹

1. Department of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y of Malaya, Kuala Lumpur 50603, Malaysia

Correspondence to: LI Tian-jia; Email: woaleiex@gmail.com

Abstract: *Writing Within Home and Nation: Reading Not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laysian Chinese Literature* is a collection of essays in the form of reading notes written by the Malaysian Chinese scholar and writer Ng Yean Leng. It is neither merely a collection of reflections on reading nor a conventional work of historical textual research. Rather, it presents a distinctive mode of “Home-and-Nation writing” that moves among personal experience, literary historical consciousness, and a commitment to public culture. Adopting the method of close reading, this paper explores how the book transforms the tension between “Home” and “Nation” into an ethics of reading and a distinctive scholarly stance through its notebook-style writing.

通信作者：woaleiex@gmail.com

引用格式：李天甲，陳穎. 論伍燕翎的“家國書寫觀”——聚焦其著作《寫在家國之內：從馬華文學出發的閱讀笱記》[J]. 東亞社會發展研究, 2026, 2(2): 8-16.

Ng Yean Leng's Home-and-Nation Writing can be understood through three dimensions. First, through cross-linguistic reading inspired by university literary education, she reflects on the local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textual "Other," thereby cultivating an emotional attachment to "Home." Second, by recovering historical materials on Malaysian Chinese literature, reconstructing literary genealogies, and reinterpreting the collective memory of the Malaysian Chinese community, she redefines "Nation" not as an abstract political concept but as a historical responsibility embedded in Malaysian Chinese literature and as a cultural community shared by Malaysian Chinese. Third, through her reflections o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education in contemporary Malaysia, knowledge production, and the self-examination of Malaysian Chinese literature, she further interpret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ome and nation as a form of public cultural practice for the Malaysian Chinese community. By examining Ng Yean Leng's conception of Home-and-Nation Writing, this paper reveals how reading becomes a form of cultural practice rooted in the local Chinese community and provides a meaningful approach to the self-representation and identity reconstruction of Malaysian Chinese literature.

Key words: Ng Yean Leng; Malaysian Chinese literature; Home-and-Nation Writing; Chinese education

前言

隨著全球化的發展，各國之間跨文化交流日益頻繁，在多重文化激烈碰撞之下，馬華作家身處的多元文化語境和多樣的文化生態賦予了他們不同的生命體驗和感悟。馬華文學傳承了特殊的殖民歷史、複雜的族群關係以及批判的華教體系，呈現出獨特的文學面貌。族群認同、文化認同和國家認同是馬華文學中的重要議題。由古至今，家始終是國的基礎和重要組成，國是家的拓深和歸屬。可以說，“家國”一詞中既包括“家”的元素，又包括“國”的元素，由家及國，再以文化傳承的方式，化家為國，家國同構，將家國、民族連為一體，家作為國的重要構成，是國的拓深，是民族的構成。

“書寫”即描寫，“家國情懷”是“家國書寫”的精神內核，“家國書寫”是對“家國情懷”的具象化表達^[1]。在傳統的宏大敘述中，“家國情懷”往往是一種自覺地將個人命運與國家命運緊密相連的共同體意識^[2]。但在馬華文學語境中，“家國情懷”內涵發生了深刻的轉變，它既關聯南來文人的離散經驗與殖民歷史，也牽動著華文教育、族群關係與在地社群的記憶。因此，“家國書寫”也成為在多重歸屬之間不斷被協商、重構的文化表達。

伍燕翎的《寫在家國之內：從馬華文學出發的閱讀笈記》（後簡稱為《寫在家國之內》）正是在這一歷史語境中誕生的。作為馬來西亞第

三代華人，她長期專注於馬來西亞華文文學與華人文化的研究與教學，並從事散文創作。她作為具有跨國經驗的“在地學人”，其“行在家國之外，寫在家國之內”的學術姿態極具代表性，為當今馬華文學的學術與創作實踐提供了一個獨特的觀察窗口。這本散文集不僅彙集了其多年來的散文隨筆與文學思考，更以“家”與“國”之間的張力為核心聚焦，記錄了針對諸多優秀馬華文學及世界文學華文文本的閱讀笈記。全書分為三輯，輯一“寫給大學青春歲月的情書”展現了伍燕翎作為文學讀者的一員在世界文學中閱讀的個人經驗；輯二“狂奔向自由的文學曠野”中伍燕翎開始在馬華作家作品中尋找“本土”認同，對馬華文學史“在場發聲”；輯三“去哪裡都是鮮花綻放”脫離純文學鑒賞，直指大馬華人的歷史創痛、文史研究方法以及華文教育的現實命運。

需要指出的是，本文所謂伍燕翎的“家國書寫觀”，並不只是指她在書中談論了若干家國議題，而是指她如何以閱讀笈記這一體裁，將世界文學閱讀、馬華文學評論與本土文化關懷貫通起來，形成一種由“他者經驗”回望本土、由文學感受推進到公共文化判斷的書寫方式。其特點並不在於單純抒發家國情懷，而在於她以“在地學人”的位置，將文學閱讀轉化為歷史記憶修復、華教關注與文化認同重構的實踐性思考。也正是在這一意義上，伍燕翎的“家國書寫觀”與通常意義上較為宏觀、抒情化的家國書寫有所不同。

因此，本文將採用文本細讀法探討《寫在家國之內》中具體的文學評價與知識生產，進一步確定伍燕翎獨特的“家國書寫觀”於當代馬華文學在地創作中的重要性。

1 大學青春透過世界文學的家國書寫

《寫在家國之內》的第一輯“寫給大學青春歲月的情書”並未急於進入馬華文學的在地語境，而是以行在家國之外的世界文學閱讀與跨文化文本經驗鋪陳出一條“向外”的閱讀路徑。“路徑”意味著一種歷史過程的動態意義，昭示了自我開放的學術面相，它絕不是返回故步自封的時代，而是對“走向世界”的全新的闡發和理解^{[3]163-169}。對此，伍燕翎強調向外的跨國經驗並不是導致文化疏離的誘因，反而是在“誤認”與“追問”的碰撞中求同存異，從而促成對馬華本土身份更清醒的審視。因此第一輯所呈現的正是一條從“他者鏡像”到“自我審視”的經驗鏈條。比較文學形象學認為，“一個作家（讀者）對異國現實的感知與其隸屬的群體或社會的集體想像密不可分，即使他們有機會親赴異國，他們筆下的形象仍然與具體的社會和歷史語境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4]25}。形象因為是他者的形象，故而是一種文化事實，它與一切社會、文化組織都無法分開，因為一個社會正是通過它來反視自我、書寫自我、反思和想像的^{[5]124}。據此，伍燕翎行在“家國”之外的閱讀正是借用豐富的域外經驗審視自我，並為後續回到“家國”之內的馬華本土書寫夯實經驗基礎。也正因為如此，這一輯的意義並不只在於鋪陳域外閱讀經驗，更在於呈現伍燕翎如何在不斷與“他者”相遇、比較和追問的過程中，逐漸形成重新理解馬華本土的思想路徑。

1.1 書寫行在家國之外的歷史反思

伍燕翎在解讀西西的《我的喬治亞》時並未停留於對微型娃娃屋藝術的讚歎，而是敏銳地捕捉到個人興趣背後隱藏的殖民批判：“要真正建造一座典型的喬治亞風格的房子，幾乎每棟房子都該有一名黑奴在一旁侍奉女主人”^{[6]17}。通過對帝國殖民史的解讀，伍燕翎對此拋

出了一個問題：“相較於現代社會，人類的精神文明究竟是朝著更光明的未來發展，還是在走向墮落的深淵”^{[6]18}？這一發問引發了她對馬來西亞本土殖民創傷經驗的歷史性思考，即在馬來西亞多元族群的政治與制度下華裔族群同樣有著被排擠過的陣痛。達尼埃爾-亨利-巴柔所說的形象是“作為反觀形象者創造文化的鏡像”^{[5]124}。這種從“他者歷史”形象中獲得的頓悟，為她後續書寫馬來西亞的殖民創傷與堅守文化主體性提供了重要的參照。這裡值得注意的是，伍燕翎並不只是從西西作品中讀出殖民批判，更是在“他者歷史”的鏡像之中，重新觸碰到理解馬來西亞本土經驗的位置。

同時伍燕翎指出西西是在“左撇子時代”時創作這本書，這看似是對作家個人風格的描述，實則暗示了西西在限制與困境中仍堅持書寫的韌性，這種韌性本身也對應了伍燕翎內心對馬華文化主體性的堅守。在馬來西亞多元族群的政治語境中，馬華文學的家國書寫本身就是一種在夾縫中堅持、在限制中突圍的韌性實踐。伍燕翎認為馬華文學的書寫選擇應既不逃離本土現實，也不向困境妥協，這種堅持的韌性也為她後來對馬華文學的本土歷史建構奠定了基礎。因此，這裡所呈現的也不只是閱讀中的個體感悟，而是伍燕翎如何由域外文本中的歷史創傷與書寫韌性，進一步回到馬華文學主體性問題的思考。

1.2 書寫行在家國之外的當代困境

如果說對西西作品的閱讀是歷史敘事的反思，那麼對保羅·奧斯特《在地圖結束的地方》的閱讀則是對個體精神維度的靈魂叩問。伍燕翎從流浪狗“骨頭先生”的故事中感悟生命的意義：“生活總有偶然與巧合交織，我們無需過度拘謹，要敢於搖擺，敢於追尋渴望。連一隻流浪狗都能在命運荒野找尋方向，我們更要敢於尋找自己的意義與方向”^{[6]25}。這段感悟看似是對個人傷痛體驗的情感抒發，實則折射出馬華知識分子的精神困境。1957 年馬來亞獨立後，馬華華裔群體始終處在國家認同與族群認同的矛盾、華語文化與本土文化的衝突、傳統與現代的碰撞之中，馬華學者開始在邊緣地帶尋找自己的精神原鄉，而“骨頭先生”用嗅覺而非視覺感知世界的方式，恰恰是馬華學者獨特的

生存隱喻。他們彷彿永遠無法進入主流話語的中心，只能用自己獨特的方式去感知這個國家的溫度，去尋找自身的位置。伍燕翎指出，早期本土的馬華文史研究長期深陷資源匱乏、資料難尋的現實困境，然而這種學術逆境反而激發了前輩本土學者強烈的文化抱負。正如方修、李錦宗等馬華文史先驅，皆是憑藉一己之力在搜羅孤本、編纂史料，從而為馬華文學的主體性建構奠定了堅實基石。這種隱喻被伍燕翎轉化為一種認識論的自覺，即承認邊緣位置本身具有的認識價值並去創造新的價值，這本身就是一種充滿生命力的抗爭，也為伍燕翎回歸本土書寫傳承華文教育的公共實踐提供了經驗基礎。也正是在這一層面上，伍燕翎所關注的已不只是個體精神上的漂泊感，而是馬華知識分子如何在邊緣處境中重新確認自身文化位置的問題。

同樣，她對於村上春樹的《挪威的森林》、柯裕棻的《冰箱》以及西西的《白髮阿娥及其他》的閱讀更是確認個體經驗在宏大家國敘事中的獨特性價值。她從渡邊、直子、綠子“死不是生的對立面，而是作為生的一部分永存”的故事中看到了人類共通的迷惘與成長創傷^{[6]32}。在《冰箱》中她對都市人的孤獨與疏離產生強烈共鳴：“那些長久依賴、彼此纏繞的情感，只有在失去之後，才終於得以釋放。而這種釋放，不過是遲來的理解，一種悔悟後的孤獨”^{[6]36}。以及《白髮阿娥及其他》中的“借阿娥一人的生命軌跡，映照香港一座城的時代變遷。”這些文本都讓她產生了現代化的思考。在當今現代化的進程中，馬華社會也面臨著華人地緣社群解體、人際關係疏離的困境。伍燕翎通過對個體精神狀態的描摹，揭示了現代性對家國共同體的衝擊，她深刻地明白家國從來不是一個抽象的政治概念，任何有效的文化保護與身份認同都要落實到個人經驗本身。正是這種對個體經驗的堅守讓她後來在書寫馬華家國時避免空泛的抒情，從而更能落到馬華文學本土作家的倫理關懷上。可以說，伍燕翎正是借這些世界文學文本中的孤獨、漂泊與創傷經驗，把對現代性的感受一步步轉譯為理解馬華社會現實處境的精神線索。

1.3 書寫行在家國之外身份認同的重構

拉康認為“自我”是通過“他者”來建構的，“自我”只有通過“他者”或“他者”的眼光才能確證其意義與價值^{[7]23}。伍燕翎的跨國閱讀所帶來的“他者”經驗更為其家國書寫提供了廣闊的空間。她借由“他者”帶來的經驗來保持馬華本土作家的身份認同，並在世界文學的出走與回望中尋找家國書寫的共鳴與參照。

她對西方離散文學的閱讀為轉向本土華人身份的認同提供了跨文化的參照。在《愛的歷史》中她分析了猶太族群的離散歷史：兩代艾瑪，跨越時空命運相連，一條追尋線索，串聯戰爭、離散、愛情與遺忘。小說不僅寫兒女情長，更是猶太族群文明史的縮影。戰爭撕裂家園，命運顛沛流離，愛與記憶卻始終跨越時光。馬華族群同樣經歷了戰爭、遷徙與離散，同樣依靠愛與記憶來維繫族群的文化認同。伍燕翎通過比較找到了與猶太人擁有《聖經》傳統宗教信仰不同的是，馬華華裔並沒有強烈的宗教認同感作為支撐，而是處在一個多元族群共存的社會中，面臨著更加複雜的身份認同問題。心理學家埃裡克森指出認同是在人與人、群體與群體的交往中所發現的差異、特徵及其歸屬感^{[8]91-110}。也正是在這種比較視野下，“本土性”不再是封閉性的地方意識，而成為一種經過跨文化對照之後的文化自覺，即他們必須在多元族群割裂、國家體制邊緣化的困境中，依靠華文教育與地緣文史記憶來維繫文化認同，傳承馬華文化。

查爾斯·泰勒認為“我對自己的認同的發現，並不意味著我是在孤立狀態中把它炮製出來的。相反，我的認同是通過與他者半是公開，半是內心的對話協商而成的^{[9]298}。在伍燕翎的域外閱讀中，“出走”是一個反覆出現的詞。她讀艾莉絲·孟若的《出走》被書中那些在平凡生活中掙扎的女性深深打動。艾莉絲·孟若擅長以自然景物映照人心，筆下冬日湖泊清冷寂寥，隱喻人物命運起伏。伍燕翎寫到：“走過人生波折的人，眼底也總會有一面湖，藏著迷茫、期許與掙扎”^{[6]40-41}。書中人物不斷尋找、逃離、回望，亦是每個人的人生寫照。這些女性的出走不是對家庭的背叛，而是對自我價值的堅定，也更反映了書寫家國認同不再是單一、封閉的

身份歸屬，而是一種允許個體協商自我價值的開放性共同體。

而對保羅·柯艾略《牧羊少年奇幻之旅》的閱讀，則讓伍燕翎對家國書寫有了更加深刻的思考。牧羊少年放棄神職，追逐沙漠寶藏，旅途歷經考驗，卻始終堅守初心。伍燕翎認為每個人年輕都有屬於自己的“天命”，心懷熱愛、奔赴理想，整個宇宙會為之助力。小說重心從不在寶藏結局，而在追夢途中的成長與修行。在她看來，馬華作家的“天命”是書寫馬華本土的歷史與現實，傳承華文文化的根脈。而這種“天命”的實現，恰恰需要不斷地“出走”，走出書齋，走出本土，去與更廣闊的世界對話。文化全球化一方面強化了身份的流動性與認同的複雜化，另一方面也刺激與強化了本土性和地方性的認同訴求^{[10]79-84}。誠如學者黃萬華所言：“華文文學的‘本土’既是歷史傳統，也是現實情境，它抵抗外來殖民性文化，但也開放於‘外來’向‘在地’的轉換中，促成‘在地’的多元性”^{[11]469}。在這一意義上，伍燕翎的“出走、回望”正是把家國書寫從情緒性的懷舊拉回到可反思、可實踐的文化行動之中，本土性不是通過與他者的隔離來維持的，反而是通過與他者的比較、對話、協商而不斷被確認和深化的。在這一意義上，“出走”對伍燕翎而言，並不是離開家國，而是在與他者的對照之中重新確認本土的位置；她所理解的家國書寫，也並不是封閉性的地方認同，而是在跨文化比較中不斷重估馬華文化自身意義的過程。

第一輯的行在家國之外並非是與馬華在地脈絡相脫離的“漫遊”，而是借他者形象帶來的經驗重新理解本土現實。正如伍燕翎在散文集《移動的光》中所說，文學教會她生命中面對的“偶然與必然”，讓她學會“釋懷與安然”這種吸收了世界文學後的開放視野，也正是這種“行在外”的張力，最終變成了她向內叩問、重返家國創作的核心內驅力^[12]。因此，伍燕翎透過世界文學的家國書寫是借“他者歷史”重新思考馬華文學的問題意識，並在比較視野中重新確認了本土書寫的必要性。

2 狂奔向自由的“家國書寫”文學

曠野

如果說《寫在家國之內》的輯一是伍燕翎透過世界文學“寫給大學青春歲月的情書”，那麼這本書的輯二則是她邀請讀者一起通過閱讀馬華名作“狂奔向自由的文學曠野”。伍燕翎在這一輯中介紹了22位著名馬華作家與他們的作品，嘗試於閱讀笈記中深入探討當代馬華文學內部複雜的歷史問題、族群關係與文化認同。她的“家國書寫觀”在這一輯中，不再僅僅是抒發身在家國之外的思考，更是一種寫在家國之內並且對馬來西亞華人社會歷史背景與現實生活的有效回應。

2.1 向自由的馬華文學世界狂奔

《寫在家國之內》的輯二名為“狂奔向自由的文學曠野”，伍燕翎在此表達的是：馬華文學並非被規範、統一的標籤化書寫，而是在不斷超越、不斷尋找新主體性的馬來西亞華人獨有的創作範式。在閱讀方路的《半島歌手》《火蛋糕》《白蹄狗》時，伍燕翎特別強調一種“狂奔”的姿態。這種“狂奔”不僅是人物命運的漂泊，更象徵著馬華文學長期以來對“自由”書寫的渴望。“方路從詩到散文，再到小說的路向是很清晰的，並且在主題、內容題材和語言方面都有著明確的聯繫”^{[13]46}。詩集《半島歌手》中的“運動詩”在馬華詩歌題材中開闢了前所未有的新路向；散文集《火蛋糕》體現了詩人對家國天下之事格外關心，對國家與社會的觀察尤為用心；微型小說集《白蹄狗》彙集了新舊作品，其中的微型小說文字細膩講究，蘊藏著不同的爆發力。“面對創作，方路總是赤誠而不設防：以詩直面現實，以散文與往事告別，以小說盡情放縱。在生命與寫作的種種命題面前，他依然保持自由與專注。這份純粹與執著，使他成為馬華文壇令人敬重的作家”^{[6]126}。

伍燕翎在這些馬華文學的閱讀笈記中，並沒有採用傳統文學史式的宏觀論述，而是通過細讀作品中的人物、語言與家國記憶，詮釋出馬華文學應該如何從邊緣位置出發，建立屬於自己獨有的“家國書寫”。伍燕翎認為文學的“狂野”恰恰體現在作家拒絕安分於任何一種固化的身份標籤。正如“作家最幸福之處，莫

過於最終找到一種自由無拘、無羈無絆的寫作狀態。是以，方路是幸福的”^{[6]124-126}。

2.2 書寫家國記憶與國家歷史傷痕

2.2.1 書寫家國記憶

《寫在家國之內》輯二中大量篇幅的書寫圍繞“家國記憶”進行展開。例如對龔萬輝《卯生年代》、薇達《邊境》、李天葆《州府人物連環志》等作品的閱讀，皆體現出伍燕翎對於書寫“家國記憶”的高度重視。伍燕翎在閱讀《卯生年代》後如此評價：“龔萬輝以散文化的小說風格，遊刃有餘地掌握敘事節奏。一則則青春誓言縱然已無法重返，卻仍能追溯其痕跡，勾勒出早已消逝的成長印記”^{[6]101}。書中的主人公大多是青少年，雖然年齡尚小，但是情緒敏感。龔萬輝以描寫青春成長與社會轉型時期的迷惘為特色，講述了自己獨特的“家國記憶”。馬華女作家薇達也是馬來西亞新生代小說家中耀眼的明星，“《邊境》更具突破性——書中僅收錄一篇中篇與一篇短篇，卻在主題、佈局、敘事技巧與語言上展現出超越同儕的能量，其實驗與先鋒意味，堪稱當代小說的一股推動力”^{[6]133}。有國外旅居經驗的薇達，透過全方位的域外描寫，採用第一人稱視角敘述出“漂泊者”的無奈與孤獨。正如馬華文學也長期存在著一個核心議題，就是“我們屬於哪裡？”即馬來西亞華人的身份認同問題。

對於最初南來的華人而言，中國雖然是文化原鄉，卻已並非現實生活的國家；而馬來西亞雖然是自己生活的國家，卻又在歷史上長期存在著身份認同方面的不穩定性因素。因此，“家國記憶”在馬華文學中往往呈現出雙重結構：既有思想文化上的“中國”，也有現實生活中的“馬來西亞”。伍燕翎的“家國書寫觀”特殊之處在於她並未執著於二元對立，而是嘗試從“家國記憶”切入，去重新詮釋馬華文學。例如在評議《州府人物連環志》時，“《州府人物連環志》的敘事規模並不宏大，人物、情節與時空層次也不及《州府紀略》那般曲折繁複，顯示出李天葆更著力穩健地勾勒華僑移民的生活圖景”^{[6]180}。可見伍燕翎關注的並不是宏大的國家歷史，而是諸如州府中的小人物、舊街道等微觀的碎片化國家記憶。這種“微觀歷史”實際上構成了馬華文學的重要根基。

2.2.2 書寫國家歷史傷痕

除了書寫家國記憶，《寫在家國之內》中伍燕翎還書寫了國家的歷史傷痕。例如依藤於1957年9月出版的《彼南劫灰錄》，為馬來亞獨立後首部馬華散文集。在《大馬華人史上的黑日——讀依藤《彼南劫灰錄》》中，伍燕翎重新觸及馬來西亞華人歷史中的戰爭創傷與族群記憶。她在書中強調歷史經驗應該如何持續影響當代人的精神結構。“這四十篇散文記錄了華人同胞親歷的民族災難與歷史記憶，彷彿一幕幕黑白影像在眼前重現。從英殖到日占的種種事件，不僅展現了華人社會反殖民鬥爭的決心，也深刻影響了國家與民族的建構過程”^{[6]137}。這類書寫具有強烈的“傷痕記憶”意義。追溯與重構歷史記憶是華人與故土聯繫的重要形式，阿萊達·阿斯曼認為歷史是提供關於自己來歷和身份認同信息的工具，它檢視和保留了值得回憶的、建構身份認同和指向未來的東西^{[1]445}。其實對於馬華文學而言，“家國”很多時候都不是“穩定”的代表。英殖歷史、日據時期、獨立後的民族政治，這些傷痕都在不斷地重塑馬來西亞華人的身份處境。因此，很多時候歷史並不是過去式，而是持續存在於當下的陰影。

尤其在《寫一出鬧劇影評——淺評賀淑芳〈別再提起〉》中，伍燕翎不僅討論歷史傷痕回憶式的文本形式，更觸及馬來西亞華人在社會關係中的身份疏離感與邊緣情感困境。“小說裡，這位舅父在妻子毫不知情的情況下改宗，最終導致他死後，本應莊重的葬禮，卻演變成極具諷刺意味的‘搶屍’鬧劇。當然，這場看似鬧劇的背後，其實折射出整個馬來西亞華人歷史與文化的深層記憶”^{[6]176-177}。傳統對“家國”的書寫往往強調國家、民族與歷史使命等方面，習慣站在宏觀角度去論述行文，而可能因此忽略日常生活中的點點滴滴。但通過伍燕翎的閱讀恰恰展現另一種可能：“家國”並不僅僅來自政治話語，它同樣存在於個人感知、親情關係與日常生活之中。因此，她所提倡的“家國書寫”從來不是簡單而宏觀的文學敘事，而是一種細膩入微、更具情感溫度的文化載體。“屍體最後終於大便完畢，並以一個響屁作為結束”^{[15]260}。看似荒誕，實則痛心。賀淑芳的《別再提起》不僅是鬧劇，更是悲劇。而且

馬來西亞這幾十年來，居然真的發生過類似的“搶屍”事件，也許這是國家的歷史傷痕仍在“滴血”。

伍燕翎在評價《寫在家國之內》輯二的這些馬華作品時，展現出她慈憫的人文主義關懷。她所關注的並不單純是馬來西亞發生的歷史事件本身，而是馬來西亞華人在家國記憶與國家歷史傷痕中的命運多舛。例如，戰爭如何改變華人的情感認知、離散如何塑造華人的身份認同、傷痕如何影響華人記憶等。這些文學評價，使她的“家國書寫觀”更加具有鮮明的人本主義色彩，她試圖透過這些閱讀笱記重新留存那些容易被馬來西亞國家敘事遺忘的華人個體記憶。

3 鮮花綻放般的“家國書寫觀”

如果說《寫在家國之內》輯二主要關注馬華文學內部複雜的歷史問題、族群關係與文化認同，那麼輯三“去哪裡都是鮮花綻放”則進一步推動了馬華文學之外的文化實踐。“至於融會貫通，則更進一步，將文學的思維與感悟延展至歷史、社會、哲學等廣闊領域，從而形成跨界的理解與洞察”^[6]。在這一輯的文學評論以及其對中文系、新紀元大學學院的書寫中，伍燕翎不再只是閱讀者角色，同時也是文化推動者與馬華文學作家。她的“家國書寫觀”也因此從文學評價延伸至馬來西亞華教、中華傳統文化的傳承與華人社會未來的建設中。如果說前兩輯中的伍燕翎主要還是以閱讀者和評論者的身份展開家國書寫，那麼到了這一輯，她的關懷已明顯由文學文本內部延伸到歷史真相、華文教育與跨國文化認同等現實議題。也正是在這一層意義上，她的“家國書寫觀”不再只是對作品的理解與評述，而進一步成為一種面向華社現實的文化實踐。

3.1 書寫馬來西亞的歷史真相

《寫在家國之內》輯三開篇的〈歷史站在真相那邊——讀《越洋控訴——峇冬加里屠殺慘案》〉，展現伍燕翎閱讀笱記中對“家國書寫”歷史意識的強烈認同。峇冬加里慘案長期處於殖民歷史的陰影之下，而伍燕翎通過閱讀與評論，將文學與歷史記憶串聯起來。她一再

強調“真相”的意義，實際上是在反思國家歷史敘述中的沉默問題。正如她所寫：“若非郭仁德與郭義民父子合著《越洋控訴——峇冬加里屠殺慘案》，首次完整揭示事件真相，這場血案或將徹底湮沒於歷史陰影”^[6]。

對於馬華社會而言，歷史不僅關乎過去，也關乎馬來西亞華人是否能夠被看見。若歷史被人遺忘，族群記憶便也可能被殘酷抹除。因此，伍燕翎文學評論的家國書寫也同時具有明顯的文化保存意識。她試圖通過閱讀與評論，讓被邊緣化的歷史真相重新進入公共討論空間。在這裡，閱讀已經不只是理解文本的過程，也成為重新召回集體記憶、推動歷史發聲的一種方式。更令人欽佩的是伍燕翎將歷史教科書中長期強調的在基礎建設上做出巨大貢獻的英國殖民者，其殘暴、殺戮的另一面再次呈現給當今讀者。不僅歷史真相歷歷在目，馬來西亞華人的族群記憶也因此得到了恢復。

3.2 書寫華文教育的文化使命

《寫在家國之內》輯三中多篇文章討論馬來西亞大專院校（以新紀元大學學院為主）的中文系、高等教育與文學研究，例如〈中文系的自我定位〉〈寫作與學術何為？〉〈分水嶺上的新紀元——兼談民辦大學何為？〉等。這些文章表面上討論馬來西亞華文教育問題，實際上也體現出伍燕翎對於華教未來的擔憂。

在馬來西亞的語境中，華文教育不僅是單純的語言教育，更關係到華人對傳統文化的繼承。馬華學者何國忠曾言：“如果說文化是族群的根本，那教育就是維持這個族群特性的最好方法”^[16]。哈羅德·伊羅生認為，語言是打造民族的素材之一，它喚醒族群意識並使之得以延續至後代，若沒有語言，民族即不存在^[17]。中文系之所以重要，並非因為它能培養文學研究者，而是因為它維繫了華社對於中華傳統文化的記憶。“新紀元大學學院在漢語教學專業的建設中對境外實踐教學所進行的探索，對於海外漢語教學專業的建設和漢語國際教育事業的推進都有一定的啟發和借鑒意義”^[18]。可見新紀元大學學院在馬來西亞對漢語教學的推動，而伍燕翎進一步強調的，則是“寫作與學術”在華教體系中的意義。在功利主義日益擴張的時代，人文學科（包括中文系）常被視為

“無用”。但她認為“尤其在馬來西亞這個多元語境中，國家究竟需要什麼樣的中文專業人才？這，正是值得深思的課題”^{[6]217}。因此，她的“家國書寫觀”並非站在頑固不化的民族主義式排他立場，而是一種聚焦華文教育的文化主體意識。她所關注的核心問題是：馬華社會在面臨當今全球化與現代化的社會變革中，如何能夠繼續保有自己文化的聲音。也正因為如此，這裡的“家國書寫”已不再只是文學層面的表達，而是進一步落實到文化傳承與教育建設的問題之中。這不僅是她推動華文教育的初衷，也體現出馬來西亞華教工作者所面臨的文化責任。

3.3 書寫跨國流動中的文化認同

《寫在家國之內》輯三還書寫了伍燕翎作為馬華作家的跨國經驗。無論是她書寫出國到訪印尼山口洋、在日本創價大學的訪學生活，還是關於其他旅行與文學活動的書寫，都體現出伍燕翎對於“跨國流動”中文化認同的理解。

傳統的“家國”觀念往往強調於固定的土地與民族邊界，但伍燕翎的“家國書寫觀”則呈現出一種更加開放的文化視野。對於身在國外的華人而言，“家”未必只有一個，“國”也自然不只是政治疆界。在跨國流動的過程中，其文化認同會呈現出不同的狀態。因此，輯三“去哪裡都是鮮花綻放”這一命題本身，便象徵著一種開放的文化態度：即無論身處何處，只要家國的文化與記憶仍在，便可以隨時重新建立精神歸屬。由此可見，伍燕翎在這一輯中所展開的，已不是單純的“出走”經驗，而是如何在流動中重新理解文化歸屬，並把這種跨國經驗轉化為對馬華本土認同的重新思考。這種跨國流動的視野，使伍燕翎的“家國書寫觀”突破了傳統的民族主義框架，轉向一種較為開放的馬來西亞華文書寫觀。

伍燕翎的《寫在家國之內》雖然以“閱讀筭記”的形式書寫，但其背後隱藏著她對於馬華文學文化認同與歷史地位的長期思考。在輯一“寫給大學青春歲月的情書”中，她以世界文學閱讀與跨文化文本經驗建構出一條由內而外的閱讀新路徑。而在輯二“狂奔向自由的文學曠野”中，她又通過對國內多名馬華作家著作的閱讀，展現出馬華文學如何在國家邊緣處境中建立其主體性。她強調聚焦於馬來西亞的地方經驗、歷史記憶與個體命運，使“家國書寫”從抽象的民族概念轉向具體的生活世界。最後在輯三“去哪裡都是鮮花綻放”中，伍燕翎則進一步將其“家國書寫觀”延伸至文化實踐層面。她關注歷史真相、華文教育、高等教育發展與跨國文化交流，展現一位馬華作家與馬華教育工作者對於未來華文文化在本國有效傳播的責任意識。

由此，伍燕翎的“家國”並不是單一、固定的政治概念，而是一種流動的文化認同。它既包含對馬來西亞華人歷史的追溯，也包含對這片蕉風椰雨中的土地深深的情感；既重視本土的地方經驗，同時還兼具跨國的國際視野；既聚焦於國內外的優秀文學文本，也強調現實生活中的文化實踐。伍燕翎並未以宏大口號定義“家國”，而是通過閱讀筭記的撰寫、促進恢復族群記憶、從而提倡華文文化行動，讓“家國”成為一種能夠被感受、被思考、被重新書寫的精神空間。在當代馬華文學評論的研究中，這種兼具本土文學性、歷史人文關懷與文化主體意識的書寫形式，體現出馬華作家對於國家歷史與未來展望的持續關注。在“家”與“國”之間，在“在地”與“世界華文文學”的交會處，這些筭記記錄了閱讀當下的遲疑、共鳴與追問。《寫在家國之內》是寫給文學讀者的書——不為指引方向，而是邀請同行，在家國之內，也在文字之中。

4 結論

參考文獻：

- [1] 任珺. 論張恨水散文中的家國書寫[D]. 安慶: 安慶師範大學, 2021.
- [2] 夏德元, 編. 家國情懷[M]. 上海: 復旦大學出版社, 2016.

- [3] 李騫. 論新時代長篇“家國情懷”的寫作路徑[J]. 文藝爭鳴, 2025(12): 163-169.
- [4] 孟華, 編. 比較文學形象學[M]. 北京: 北京大學出版社, 2001.
- [5] 達尼埃爾-亨利·巴柔. 從文化形象到集體想像物[M]. 孟華, 編. 比較文學形象學. 北京: 北京大學出版社, 2001: 124.
- [6] 伍燕翎. 寫在家國之內: 從馬華文學出發的閱讀笱記[M]. 有人出版社, 2026.
- [7] 方生. 後結構主義文論[M]. 濟南: 山東教育出版社, 1999.
- [8] 袁娥. 民族認同與國家認同研究述評[J]. 民族研究, 2011(5): 91-103, 110.
- [9] 查爾斯·泰勒. 承認的政治[M]. 汪暉, 陳燕谷, 編. 文化與公共性. 北京: 三聯書店出版社, 2005: 298.
- [10] 劉小新. 鄉愁、華語文學與中華性[J]. 福建論壇(人文社會科學版), 2016(12): 79-84.
- [11] 黃萬華. 百年海外華文文學研究[M]. 南昌: 百花洲文藝出版社, 2022.
- [12] 伍燕翎. 移動的光[M]. 大將出版社, 2007.
- [13] 曾維龍. 論方路的跨界寫作: 從詩到奈米小說: 在地的創作實踐[J]. 華文文學, 2021(157): 43-49.
- [14] 阿萊達·阿斯曼. 回憶空間: 文化記憶的形式與變遷[M]. 潘璐, 譯. 北京: 北京大學出版社, 2016.
- [15] 賀淑芳. 別再提起[M]. 賀淑芳. 迷宮毯子. 臺北: 寶瓶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2012: 260.
- [16] 何國忠. 馬來西亞華人: 認同、文化與族群政治[M]. 華社研究中心, 2006.
- [17] 哈羅德·伊羅生. 群氓之族: 群體認同與政治變遷[M]. 鄧伯臣, 譯. 桂林: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2015.
- [18] 王睿欣. 馬來西亞漢語教學專業境外實踐教學初探: 以新紀元大學學院為例[J]. 廊坊師範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 2019, 35(1): 128.

版權聲明

© 2026 作者版權所有。本文依據“知識共享署名 4.0 國際許可協議”(CC BY 4.0)以開放獲取方式發布。該許可允許使用者在任何媒介中自由使用、複製、傳播與改編文章(含商業用途),惟須明確署名原作者及出處,並注明所作修改(如有)。完整協議詳見:<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deed.zh-hans>

出版聲明

所有出版物中的陳述、觀點及資料僅代表作者及供稿者個人立場,與 Brilliance Publishing Limited 及/或編輯人員無關。Brilliance Publishing Limited 及/或編輯人員對因內容所提及的任何理念、方法、說明或產品所導致的人身或財產損害概不負責。

DOI: 10.53104/dyshfzyj.2026.02.02.003

文化傳播視域下《哪吒之魔童降世》字幕中文化負載詞的英譯研究

周文強¹，楊杰¹

1. 江漢大學，湖北 武漢 430056

摘要：隨著中國影視作品國際傳播進程不斷加快，電影字幕已經成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跨語言傳播的重要媒介。對於以中國傳統神話為文化基礎的國產動畫電影而言，影片中大量具有鮮明民族文化特色的詞語往往缺乏完全對應的英語表達，這些文化負載詞的翻譯直接影響海外觀眾對中國文化信息的理解。《哪吒之魔童降世》以中國傳統神話人物哪吒為基礎，通過現代化的人物塑造、敘事方式和價值表達，對傳統神話進行了重新詮釋，影片中涉及大量神話人物、宗教概念、傳統器物、社會稱謂和文化意象，具有較為典型的文化傳播價值。本文以《哪吒之魔童降世》英文字幕中的文化負載詞為研究對象，從文化傳播視角出發，對影片中的文化負載詞進行分類，並結合具體字幕案例分析其英譯策略及文化信息傳遞情況。文章選取“混元珠”“靈珠”“魔丸”“天劫”“太乙真人”“崑崙十二金仙”“山河社稷圖”“天庭”“龍宮”“天牢”等神話和宗教文化負載詞，以及“我命由我不由天”等具有價值觀念和文化意蘊的表達進行分析。研究發現，影片字幕主要採用直譯、意譯、音譯、文化保留、功能轉換和省譯等方式處理文化負載詞。其中，直譯能夠較好地傳遞基本語義，音譯和文化保留有利於維護中國文化符號的獨特性，意譯和功能轉換則能夠降低目的語觀眾的理解障礙。與此同時，不同翻譯策略也可能造成不同程度的文化信息弱化。總體而言，《哪吒之魔童降世》的字幕翻譯在文化保留和觀眾理解之間進行了較為明顯的平衡，但部分中國傳統神話概念仍難以通過單一詞語實現完整轉換。因此，中國動畫電影字幕翻譯應在保證語言自然和字幕可讀性的基礎上，適當保留文化差異，並充分借助畫面、聲音和情節等多模態信息，實現中華文化信息的有效傳遞。

關鍵字：《哪吒之魔童降世》；文化傳播；文化負載詞；字幕翻譯；英譯

A Study on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Culture-Loaded Words in the Subtitles of *Ne Zh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Communication

ZHOU Wen-qiang¹, YANG Jie¹

1. Jiangnan University, Wuhan 430056, P. R. China

Correspondence to: YANG Jie

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advancement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of Chinese film and television works, film subtitles have become an important medium for the cross-linguistic transmiss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For domestic animated films rooted in traditional Chinese mythology, many expressions with distinctive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often lack direct equivalents in English. The translation of these culture-loaded words directly affects overseas audiences' understanding of Chinese cultural information. *Ne Zha* is based on

引用格式：周文強，楊杰. 文化傳播視域下《哪吒之魔童降世》字幕中文化負載詞的英譯研究[J]. 東亞社會發展研究, 2026, 2(2): 17-28.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mythological figure Nezha and reinterprets the original myth through modern characterization, narrative methods, and value expression. The film contains a large number of mythological figures, religious concepts, traditional objects, social forms of address, and cultural images, giving it significant value for cultural communication. This study takes the culture-loaded words in the English subtitles of *Ne Zha* as its research obje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communication, it classifies these culture-loaded words and analyzes their English translation strategies and the transmission of cultural information through specific subtitle examples. The analysis focuses on mythological and religious culture-loaded words such as “Chaos Pearl,” “Spirit Pearl,” “Demon Pill,” “heavenly tribulation,” “Taiyi Zhenren,” “the Twelve Golden Immortals of Kunlun,” “the painting of mountains and rivers,” “heavenly court,” “dragon palace,” and “heavenly jail,” as well as value-laden and culturally meaningful expressions such as “I am the master of my fate.” The study finds that the subtitles mainly employ literal translation, free translation, transliteration, cultural retention, functional transformation, and omission in dealing with culture-loaded words. Literal translation is generally effective in conveying basic semantic meanings, while transliteration and cultural retention help preserve the uniqueness of Chinese cultural symbols. Free translation and functional transformation can reduce comprehension difficulties for target-language audiences. However, different translation strategies may also lead to varying degrees of cultural information loss. Overall, the subtitle translation of *Ne Zha* maintains a relatively clear balance between cultural preservation and audience comprehension, although some concepts rooted in traditional Chinese mythology remain difficult to convey fully through a single English expression. The translation of subtitles in Chinese animated films should therefore preserve cultural differences where appropriate while ensuring natural language and subtitle readability. It should also make full use of multimodal information, including images, sound, and narrative context, to facilitate the effective transmission of Chinese cultural information.

Key words: *Ne Zha*; cultural communication; culture-loaded words; subtitle translation; English translation

1 引言

1.1 研究背景

近年來，隨著中國文化國際傳播能力不斷增強，國產電影逐漸成為講述中國故事、傳播中國文化的重要媒介。尤其是國產動畫電影，在傳統文化資源的現代化表達方面表現出了較強的創造力。趙夢越指出，近年來以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為創作內核的國產動畫電影不斷發展，動畫電影已經成為重要的文化傳播載體，而如何實現傳統文化資源與現代影視表達之間的有效結合，是國產動畫進一步發展的重要問題^[1]。傅成宏也認為，《哪吒之魔童降世》通過文化符號的現代演繹、傳統故事的新編以及文化思想的現代詮釋，實現了傳統文化基因的新表達^[2]。

2019 年上映的《哪吒之魔童降世》正是這一發展趨勢中的典型作品。影片雖然取材於中

國傳統神話中的哪吒形象，但並沒有完全按照傳統故事進行復述，而是重新設置了哪吒的身份、人物關係和故事衝突。影片中的哪吒從傳統神話中的少年英雄轉變為一個受到身份偏見、命運安排和社會排斥影響的現代少年，其核心矛盾也由傳統神話中的降妖除魔轉化為“個體能否擺脫命運和他人定義”的現代問題。王苗指出，傳統動畫題材只有結合當代社會背景，對傳統故事和人物進行繼承性突破，才能使經典形象更容易被現代觀眾接受^[3]。

這種傳統文化的現代化重構也使《哪吒之魔童降世》具有明顯的跨文化傳播價值。喬文麗從跨文化傳播角度指出，該片通過內容適配、文化符號轉譯、情感共鳴和傳播渠道等多個方面實現傳統文化的對外傳播^[4]。鄭茜在比較《功夫熊貓》和《哪吒之魔童降世》時也指出，兩部作品雖然都利用中國傳統文化資源，但其文化傳播方式存在差異，《哪吒之魔童降世》更加突出本土文化創新，通過對傳統神話人物和主題

的現代重構實現文化傳播^[5]。

然而，傳統文化能否真正實現跨文化傳播，並不只取決於電影故事和視覺效果。語言同樣是文化傳播的重要媒介。對於海外觀眾而言，字幕是理解中國電影對白和文化信息的重要渠道。尤其是在《哪吒之魔童降世》中，“混元珠”“靈珠”“魔丸”“天劫”“太乙真人”“崑崙金仙”等詞語都具有明顯的中國文化屬性。如果這些詞語僅僅按照一般詞典意義進行轉換，原語中所包含的神話體系、宗教觀念和文化意象就可能出現損失。

韓娜針對《哪吒之魔童降世》字幕翻譯的研究指出，影片字幕涉及文化負載詞、方言和修辭等多種翻譯難點，文化和語用層面的功能對等是字幕翻譯需要重點關注的問題^[6]。這說明電影字幕翻譯並不是單純的語言轉換，而是文化信息重新編碼的過程。

因此，本文將《哪吒之魔童降世》中的文化負載詞作為主要研究對象，以文化傳播為研究視角，通過具體字幕案例分析不同翻譯策略如何影響中國文化信息的傳遞，重點回答三個問題：第一，影片中主要存在哪些類型的文化負載詞；第二，這些文化負載詞主要採用了哪些英譯策略；第三，不同翻譯策略在文化保留和海外觀眾理解之間產生了怎樣的結果。

1.2 研究意義

現有關於《哪吒之魔童降世》的研究已經涉及傳統文化創新、現代性重構、跨文化傳播、東方美學和敘事策略等多個方面。例如，李瑩瑩從角色造型、色彩體系和視覺敘事等方面討論了影片與東方美學的融合^[7]；尚永霞從傳統符號、視覺符號和主題符號等方面分析了影片的文化符號體系^[8]；梁冰則從皮爾斯符號學角度討論了影片中的身份建構問題^[9]。這些研究為理解影片的文化價值提供了重要基礎。

但是，從英語翻譯專業角度來看，還需要進一步追問一個問題：影片中的中國文化信息是如何通過英語字幕進入目的語文化的？

這也是本文研究的主要意義所在。通過對具體文化負載詞的英譯進行分析，可以將宏觀的“文化傳播”問題落實到具體語言材料上，從而更加清楚地觀察中國文化在翻譯過程中的

保留、轉換和損失。

2 文化負載詞與電影字幕翻譯

2.1 文化負載詞的基本特徵

文化負載詞是指具有明顯文化特徵、承載特定民族歷史、社會、宗教、生活方式或價值觀念的詞語。這類詞語通常具有較強的文化依附性，其意義不僅來自語言本身，也來自特定文化背景。《哪吒之魔童降世》中的文化負載詞尤其突出。例如，“靈珠”和“魔丸”屬影片虛構的神話概念，但它們建立在中國傳統神話和宗教文化基礎之上；“太乙真人”“金仙”等表達則與中國道教神話體系有關；“龍宮”“天庭”“天牢”等詞語又體現了中國傳統神話中的空間體系。因此，對這些詞語進行翻譯時，譯者實際上面對的是兩個層次的問題：一是如何傳遞詞語的基本意義；二是如何傳遞詞語背後的文化意義。

2.2 電影字幕翻譯的特殊性

電影字幕不同於一般文學文本。觀眾觀看電影時，需要同時處理聲音、畫面和文字信息，因此字幕必須簡潔、清晰，並且與畫面和人物對白保持同步。這意味著文化負載詞不能無限增加解釋。例如，如果將“太乙真人”翻譯成一個很長的解釋性句子，雖然可能更加容易理解，但會影響觀眾觀看電影。因此，字幕翻譯需要在文化解釋和媒介限制之間取得平衡。《哪吒之魔童降世》的多模態特徵尤其明顯。影片中的神話人物、法器和神話空間不僅通過語言表達，也通過人物造型、動作和場景進行表現。因此，在分析字幕翻譯時，也需要將字幕放置在完整電影語境中考察。

3 《哪吒之魔童降世》文化負載詞的類型

結合影片內容，本文將文化負載詞劃分為四類：神話宗教文化負載詞、物質文化負載詞、社會文化負載詞以及價值觀念和語言文化負載詞。神話宗教文化負載詞是影片中最突出的類型，包括“混元珠”“靈珠”“魔丸”“天劫”“太乙真人”“金仙”“天庭”等。這些

詞語構成了影片基本的神話世界觀。物質文化負載詞主要包括“火尖槍”等傳統神話兵器，以及具有中國文化特徵的法器和器物。社會文化負載詞主要涉及“師父”“師兄”等人物關係表達，以及“李府”“龍宮”等具有特定文化背景的身份和空間概念。價值觀念和語言文化負載詞則主要體現影片中的命運觀、親情觀和主體意識，例如“我命由我不由天”以及“如果你不喜歡自己的命運，就戰鬥到底”等表達。

4 《哪吒之魔童降世》文化負載詞的英譯案例分析

4.1 神話文化負載詞的翻譯

4.1.1 “混元珠”——“Chaos Pearl”

影片開篇介紹了“混元珠”的來源。公開英文字幕將其譯為：Chaos Pearl。

英文字幕中出現了“the spiritual energy of heaven and earth gave birth to the Chaos Pearl”的表達，另一字幕版本也採用了“Chaos Pearl”。

“混元珠”是整個故事世界觀的核心概念。“珠”在這裏具有具體物質意義，而“混元”則包含混沌、原初狀態等神話文化含義。譯文使用“Chaos Pearl”，基本保持了原詞的結構。

從翻譯策略來看，這種處理屬於以直譯為基礎的語義轉換。“Pearl”直接傳遞“珠”的物質意義，“Chaos”則將“混元”的核心語義概括出來。這種譯法的優點是結構清楚，並沒有使用英語文化中的其他神話概念進行替換，從而避免了文化錯位。同時，“Chaos”又能夠幫助英語觀眾理解這一物體與混亂、混沌力量之間的關係。但是，“Chaos”並不能完全等同於中國傳統文化中的“混元”。“混元”具有更加複雜的哲學和神話意味，因此譯文在保證基本理解的同時不可避免地存在文化信息簡化。

4.1.2 “靈珠”——“Spirit Pearl”

影片中“混元珠”被分化為“靈珠”和“魔丸”，英文字幕採用：the Spirit Pearl and the Demon Pill。

相關英文字幕明確出現這一對應關係。靈珠”譯為“Spirit Pearl”，基本採取直譯方式。

“Pearl”與“珠”保持對應，“Spirit”則傳達“靈”的基本含義。這一譯法的一個重要作用是與“Demon Pill”形成結構上的對照：Spirit Pearl Demon Pill。這種對應關係使英語觀眾能夠快速理解影片中的二元結構。從文化傳播角度來看，“Spirit”雖然無法完全呈現中國傳統文化中“靈”的內涵，但至少沒有將其替換成某一個西方宗教概念，因此仍然保留了較強的文化開放性。

4.1.3 “魔丸”——“Demon Pill”

“魔丸”的英文字幕譯為：Demon Pill。公開字幕版本中明確採用了這一譯法。這一譯法同樣屬較明顯的直譯。

“Demon”傳達“魔”的基本意義，“Pill”則對應“丸”。這種翻譯非常簡潔，符合電影字幕的特點。但是，“丸”在中國傳統文化中並不只是英語意義上的“pill”。它可以與傳統煉丹文化、神話故事中的靈物等建立聯繫，而“pill”在英語語境中首先容易讓人想到藥物。因此，該譯法在語言層面較為準確，但文化層面的對應並不完全。

這一案例說明，字幕翻譯中的“準確”並不意味著文化意義完全等值。譯者需要在有限的字幕空間內優先保證核心故事信息，而無法對所有文化背景進行完整解釋。

4.1.4 “天劫”——“curse of heavenly tribulation”

“天劫”是影片中極具中國神話特色的概念。英文字幕將其處理為：a curse of heavenly tribulation。另一字幕版本也出現了“heaven-made curse”等表達。“天劫”並不是普通意義上的災難，而是中國神話和傳統宗教文化中帶有命運、天意和劫難色彩的概念。“heavenly”對應“天”，“tribulation”則表現“劫難”的意味。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譯者沒有使用普通的“disaster”，而是選擇了具有宗教色彩的“tribulation”。因此，該譯法具有明顯的文化補償作用。“tribulation”雖然不能完整解釋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天劫”，但其宗教色彩能夠在一定程度上幫助英語觀眾理解這一概念並非普

通自然災害。

4.1.5 “太乙真人”——“Taiyi Zhenren”

影片中的人物“太乙真人”在英文字幕中被譯為：Taiyi Zhenren。公開字幕直接使用了這一表達。這裏沒有把“真人”直接翻譯成普通英語詞語，而是保留了拼音形式。這屬典型的文化保留策略。“真人”是中國道教文化中的特定身份稱謂，在英語文化中不存在完全對應的詞語。如果强行翻譯成“real person”顯然會產生語義錯誤，而使用“immortal”又可能擴大或改變原有含義。因此，保留“Zhenren”雖然增加了英語觀眾的陌生感，卻避免了文化誤譯。

對於文化傳播而言，這種“保留陌生性”的方式具有重要意義。它告訴目的語觀眾，這個概念屬於一個與自身文化不同的神話和宗教體系。

4.1.6 “昆侖十二金仙”——“Golden Immortals of Kunlun”

影片中出現：my 12 Golden Immortals of Kunlun 以及：Golden Immortals of Kunlun 等表達。

“昆侖”被直接保留為“Kunlun”，而“金仙”被譯為“Golden Immortals”。這種處理採取了“專名保留+語義翻譯”的方式。

“Kunlun”是中國傳統神話體系中的重要文化空間，直接保留可以最大限度維持文化身份；

“Immortal”則能夠讓英語觀眾理解“仙”具有超自然、長生等屬性。這種處理比簡單將“昆侖”替換成英語文化中的天堂或聖山更加合理，因為後者可能造成文化體系的錯誤對應。

4.2 神話空間和文化意象的翻譯

4.2.1 “天庭”——“heavenly court”

影片中“天庭”被譯為：the heavenly court，英文字幕中多次出現“heavenly court”。

“court”原本可以表示宮廷、朝廷，因此與“天庭”在組織結構和空間意義上具有一定對應關係。這一譯法比較巧妙地保留了中國神話中“天界具有類似人間朝廷的等級制度”這一文化想象。如果直接譯成“heaven”，雖然能夠傳遞“天界”的概念，卻會損失“庭”所體現的政治和等級結構。因此，“heavenly court”比簡單的“heaven”具有更加豐富的文化信息。

4.2.2 “龍宮”——“dragon palace”

影片中龍族所在的空間被譯為：the dragon palace，英文字幕中明確出現這一表達。這一譯法屬典型直譯：龍 → dragon 宮 → palace。雖然“dragon”在西方文化中也存在，但中西方“龍”的文化意義並不相同。中國龍通常具有祥瑞、權力和神聖等文化意義，而西方 dragon 則經常與危險、邪惡等意義聯繫起來。因此，“dragon palace”雖然字面上簡單，卻容易使不同文化背景下的“龍”產生不同聯想。這也說明，文化負載詞翻譯並不只是詞語層面的對應，還涉及目的語文化中的既有文化聯想。

4.2.3 “天牢”——“heavenly jail”

影片中龍族被描述為處於：this heavenly jail 的狀態。“天牢”直譯為“heavenly jail”，保留了原詞“天+牢”的結構。這種翻譯方式比較簡潔，同時能夠幫助英語觀眾理解該空間既屬“天界”體系，又承擔監禁功能。值得注意的是，影片並沒有將龍宮塑造成一個簡單的宮殿，而是通過“prison”等表達強調其實際上是一個囚禁空間。英文字幕中出現：in reality, it is a prison，這使得“龍宮”這一中國神話空間獲得了新的現代敘事意義。

4.2.4 “山河社稷圖”——“the painting of mountains and rivers”

影片中太乙真人向哪吒介紹江山社稷圖時，字幕出現：the world inside the painting of mountains and rivers 以及：this landscape brush 等表達。這一案例非常值得分析。“山河社稷圖”不僅是一個物品名稱，同時還具有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山河、社稷和國家空間意象。但英文字幕沒有採用一個非常複雜的固定譯名，而是解釋其功能：the world inside the painting of mountains and rivers 這種處理明顯屬意譯+功能解釋。它沒有完全解釋“社稷”的傳統文化含義，卻直接告訴觀眾這是一個“存在於山河畫卷中的世界”。從電影傳播角度而言，這種方式非常符合字幕特點，因為觀眾同時可以看到畫面，畫面能夠補充文字無法表達的文化信息。

4.3 傳統法器和物質文化負載詞的翻譯

4.3.1 “火尖槍”——“Fire-tipped spear”

影片中的“火尖槍”在英文字幕中出現：Fire-tipped spear，公開字幕文本中可以看到這一表達。

該譯法採用了直譯：火 → Fir 尖 → tipped 槍 → spear。這種翻譯非常符合英語表達習慣，同時保留了兵器的基本特徵。但是，“火尖槍”作為哪吒的傳統法器，其文化意義並不只是“一把帶火的長矛”。中國神話中法器與人物身份存在緊密聯繫。因此，這一翻譯更多傳遞的是物質層面的文化信息，而人物與法器之間的傳統文化聯繫則需要通過電影畫面和故事背景進行補充。

4.3.2 “指點江山筆”——“landscape brush”

影片中與江山社稷圖相關的特殊法器被譯為：landscape brush，英文字幕中可以看到：

“With a stroke of this landscape brush, you can change whatever you want in the painting!” 這一翻譯沒有逐字翻譯“指點江山筆”，而是將其功能轉換為“landscape brush”。“landscape”對應山河景觀，“brush”對應筆。這種處理具有較強的功能性。對於不熟悉中文政治文化典故的英語觀眾來說，“landscape brush”比一個完全陌生的直譯名稱更容易理解。但與此同時，“指點江山”在中文中還具有評論天下、掌控局勢等文化內涵，這部分信息在譯文中被弱化了。因此，該案例可以作為功能轉換導致文化信息簡化的典型案例。

5 社會文化負載詞的翻譯

5.1 “師父”——“master”

影片中太乙真人與哪吒之間的關係通過“master”表達。英文字幕中多次出現：Master 以及：Call me master. “師父”譯為“master”比“teacher”更加接近傳統師徒關係。如果譯為“teacher”，容易讓英語觀眾理解為普通學校教師；而“master”在英語中可以表達師傅、技藝傳承者等含義，因此更符合影片中的師徒關係。但“master”也具有主人、控制者等其他含義，因此並不能完全複製中文“師父”的倫理內涵。

這一翻譯體現了字幕翻譯中典型的功能對等思路，即優先傳遞人物之間的關係功能，而

不是追求形式上的完全對應。

5.2 “師兄/師弟”關係的轉換

影片中的人物關係具有傳統師門結構，英文字幕在相關語境中主要通過“master”

“disciple”等詞語表達師門關係。例如開篇英文字幕中出現：my master sent me and a fellow disciple，這裏的“fellow disciple”能夠表達“同門弟子”的關係。“disciple”比普通的“student”更加接近傳統宗教和師門關係，因此具有一定的文化適應作用。

這種處理說明，在翻譯社會文化負載詞時，譯者並不一定需要尋找完全對應的中文詞，而是可以尋找能夠表達相同社會關係的英語詞語。

6 宗教文化負載詞的翻譯

6.1 “仙”——“immortal”

影片中“仙”相關表達多次被譯為：immortal，例如字幕中出現：immortal techniques 以及：Golden Immortals of Kunlun。“immortal”能夠傳達“長生不死、超自然存在”的基本特徵，因此具有較高的功能對應性。但是，中國文化中的“仙”與西方文化中的“immortal”仍然存在明顯差異。“仙”與道教思想、修煉體系以及中國神話世界觀存在聯繫，而“immortal”在英語文化中並不必然具有同樣的宗教背景。因此，這種譯法屬於一種近似文化對應。

6.2 “仙術”——“immortal techniques”

影片中“仙術”被處理為：immortal techniques 公開字幕中可以看到：“From this day forth, I will teach you kunlun's immortal techniques here.”這裏的“techniques”體現的是“術”的技能含義，而“immortal”則說明其屬“仙”的體系。這種翻譯比簡單使用“magic”更接近原文文化體系，因為“magic”容易使英語觀眾聯想到西方魔法。因此，“immortal techniques”在一定程度上實現了文化區分。

6.3 “變化術”——“disguising spell”

影片中“變化術”被譯為：the disguising spell，這一譯法沒有採用完全字面的

“transformation technique”，而是強調其具體功能，即“偽裝、變形”。“spell”能夠幫助英語觀眾理解其具有超自然屬性。但是，“變化術”在中國神話中具有更豐富的變形和法術文化背景，因此“disguising spell”實際上縮小了原詞的意義範圍。這說明功能性翻譯雖然有助於觀眾理解，但也可能造成文化信息的部分損失。

7 語言文化負載詞和價值觀表達的翻譯

7.1 “我命由我不由天”——“I am the master of my fate”

這是全文最值得重點討論的案例。在公開英文字幕中，哪吒在與命運進行抗爭時說：

I am the master of my fate!

並進一步說：

I'm the one who decides whether I'm an immortal or a demon!

這一表達並非簡單的字面翻譯“my fate is determined by me, not by heaven”，而是進行了明顯的英語文化表達轉換。中文“我命由我不由天”中，“天”具有明顯的中國傳統文化含義。

“天”不僅指自然意義上的天空，還與“天命”“天意”等概念有關。

英文譯文：

I am the master of my fate.

則直接突出“我”對“命運”的控制。從文化傳播角度來看，這種翻譯雖然弱化了“天”這一中國文化意象，但增強了英語觀眾對影片核心價值觀的理解。尤其是“master of my fate”強調個人主體性，與影片中哪吒反抗命運、擺脫他人定義的主題高度一致。因此，該案例可以看作文化意象弱化與核心價值強化並存的典型。

7.2 “我就是我”式主體意識的強化

影片後半部分繼續通過：

You are the only one who controls what you become.

來表達個人命運掌控。字幕中還出現：

If you don't like your fate, fight it until the bitter end.

這些表達雖然不一定屬於狹義的文化負載詞，但在影片文化傳播中具有重要意義。它們將中國神話故事中的傳統命運觀轉化成英語觀眾容易理解的現代價值表達。因此，文化傳播並不只是傳播“天劫”“靈珠”等文化符號，也包括傳播這些符號背後的價值觀。

7.3 “命運已定”——“My fate was sealed”

影片中出現：

My fate was sealed the moment I was born.

隨後哪吒反駁：

Other people's opinions are bullshit! You are the only one who controls what you become.

這裏“命運已經注定”的傳統思想被轉化為英語中的“fate was sealed”。“sealed”具有“已經確定、無法改變”的意義，與中文“命已定”具有較強功能對應。而隨後“you are the only one who controls what you become”又形成鮮明對立。從文化傳播角度看，這一組字幕共同構成了影片最重要的文化價值衝突：命運安排→個體選擇，這比單獨分析一個詞更加有意義，因為文化傳播的最終單位並不一定是詞語，而可能是完整的文化觀念。

8 其他具有文化傳播價值的字幕案例

8.1 “天機不可泄露”——“Heaven's secrets must not be revealed”

英文字幕中出現：

Heaven's secrets must not be revealed.

這一表達與中文“天機不可泄露”具有較明顯的對應關係。“天機”被處理為“heaven's secrets”，沒有直接使用“secret of fate”等更加解釋性的表達。這裏的“heaven”保留了“天”的文化色彩，“secrets”則解釋了“機”的基本語義。因此，該譯法屬於一種語義解釋型直譯。其優勢在於英語觀眾能夠理解基本含義，同時

保留“heaven”這一中國神話世界觀中的重要文化概念。

8.2 “降妖除魔”——“slay monsters for the people”

影片字幕中相關表達被處理為：

Slay monsters for the people?

這一翻譯沒有直接採用“eliminate demons”，而是將“妖魔”轉化成“monsters”。“monster”是英語觀眾比較熟悉的概念，因此可以降低理解難度。但從文化角度看，“妖魔”在中國神話體系中與“monster”並不完全等價。“妖”可能具有由動物、植物等修煉形成的特殊身份，而“魔”又具有另外的文化含義。因此，這是一種典型的歸化處理。它犧牲了一部分中國神話體系中的概念差異，但提高了英語觀眾對情節的即時理解。

8.3 “妖”——“demon”

影片中村民不斷將哪吒稱為：demon

例如：

“Since they think of me as a demon, then I'll show them what a real demon looks like!”

這裏“demon”實際上參與了哪吒身份的建構。中文“魔丸”“妖怪”“魔”等詞語共同構成了哪吒的社會標籤，而英語字幕中的“demon”則承擔了類似功能。這說明文化負載詞不僅傳遞文化概念，還能夠參與人物塑造。

9 文化負載詞翻譯策略的綜合分析

通過以上案例可以發現，《哪吒之魔童降世》的字幕翻譯並不存在單一的翻譯模式，而是根據不同文化負載詞的性質進行調整。

表 1

類型	中文表達	英文字幕	主要策略	文化傳播特點
神話文化	混元珠	Chaos Pearl	直譯+語義轉換	保留神話概念
神話文化	靈珠	Spirit Pearl	直譯	保留二元結構
神話文化	魔丸	Demon Pill	直譯	基本語義清晰
神話文化	天劫	curse of heavenly tribulation	語義轉換	保留宗教色彩
宗教文化	太乙真人	Taiyi Zhenren	音譯/保留	保留文化身份
宗教文化	金仙	Golden Immortal	直譯	建立功能對應
神話文化	崑崙	Kunlun	音譯/保留	保留文化地名
神話文化	天庭	heavenly court	直譯	保留神話政治結構
神話文化	龍宮	dragon palace	直譯	保留文化空間
神話文化	天牢	heavenly jail	直譯	保留神話空間
物質文化	火尖槍	Fire-tipped spear	直譯	突出器物功能
物質文化	山河社稷圖	painting of mountains and rivers	意譯	強化功能理解
物質文化	指點江山筆	landscape brush	功能轉換	降低理解難度
社會文化	師父	master	功能對應	表達師徒關係
社會文化	同門弟子	fellow disciple	功能對應	保留師門關係

宗教文化	仙	immortal	近似對應	傳遞超自然屬性
宗教文化	仙術	immortal techniques	語義轉換	保留神話體系
宗教文化	變化術	disguising spell	功能轉換	強化即時理解
價值文化	我命由我不由天	I am the master of my fate	文化轉換	強化主體意識
價值文化	命運已定	My fate was sealed	功能對應	傳遞宿命觀
價值文化	與命運抗爭	fight it until the bitter end	意譯	強化抗爭精神
神話文化	天機不可泄露	Heaven's secrets must not be revealed	直譯+解釋	保留“天”意象
神話文化	降妖除魔	slay monsters	歸化	降低文化障礙
神話文化	妖魔	demon/monsters	歸化	強化目的語理解
神話文化	龍族	dragon clan	直譯	保留族群概念

這些案例表明，影片字幕翻譯實際上形成了一個比較明顯的策略梯度：越是具有專名性質和文化身份功能的詞語，越傾向於保留；越是需要保證觀眾即時理解的表達，越傾向於意譯和功能轉換。

10 文化傳播視域下字幕翻譯中的文化保留與文化損失

10.1 文化保留：讓“中國性”進入英語文本

《哪吒之魔童降世》的字幕翻譯並沒有將所有中國文化概念完全歸化。例如“Taiyi Zhenren”“Kunlun”等表達直接保留了中國文化名稱。這樣的處理使英語觀眾面對一個具有陌生性的文化體系。從文化傳播角度看，這種陌生性並不一定是缺點。如果所有文化負載詞都被轉化成英語文化中的熟悉概念，那麼海外觀眾雖然容易理解電影，卻可能無法意識到影片所表現的是中國文化。傅成宏指出，《哪吒之魔童降世》的文化傳播價值正來自傳統文化符號、故事和思想的重新表達^[2]。因此，字幕翻譯也應該保留一部分文化差異。

10.2 文化損失：不可避免的意義簡化

但是，文化保留並不能解決所有問題。例如“魔丸”譯為“Demon Pill”，雖然基本語義

明確，但“丸”背後的傳統文化聯想難以通過“pill”完整體現；“dragon”雖然能夠翻譯“龍”，但中西方文化中的龍並不具有完全相同的文化意義。同樣，“我命由我不由天”翻譯成“I am the master of my fate”之後，“天”這一中國文化意象有所弱化，但“主體意識”卻得到了強化。因此，字幕翻譯中存在一種不可避免的文化轉換：文化符號可能減少，但核心文化功能可能得到保留。這也是評價文化負載詞翻譯時不能只看“是否逐字對應”的原因。

11 字幕翻譯對《哪吒之魔童降世》文化傳播的作用

《哪吒之魔童降世》的文化傳播並不是簡單傳播“哪吒”這個人物，而是傳播一套由神話符號、價值觀念和現代敘事共同構成的文化意義系統。

首先，字幕翻譯幫助海外觀眾建立影片的神話世界觀。“Chaos Pearl”“Spirit Pearl”“Demon Pill”“heavenly court”“Dragon Palace”等詞語共同構建了一個具有中國神話特色的世界。

其次，字幕翻譯幫助海外觀眾理解人物身份。“Taiyi Zhenren”“Golden Immortals of

Kunlun”等表達保留了中國神話體系中的人物和組織名稱，使英語觀眾能夠接觸到中國文化中特有的神話人物體系。

再次，字幕翻譯幫助影片傳遞現代價值觀。《哪吒之魔童降世》並不是簡單講述傳統哪吒故事，而是強調個體成長、自我認同和命運選擇。英文字幕中的：

“I am the master of my fate.”

以及：

“You are the only one who controls what you become.”

都明顯強化了這一價值主題。

這與影片傳統神話現代化重構的總體方向是一致的。王苗認為，傳統神話人物需要通過現代價值表達實現新的文化生命力^[3]；劉佳靜、曹靜儀也指出，現代哪吒形象已經由傳統神性符號轉向具有人性和現實意義的“反英雄”角色^[10]。因此，字幕翻譯實際上參與了傳統神話現代價值的跨文化傳播。

12 對中國動畫電影字幕翻譯的啓示

《哪吒之魔童降世》的案例說明，中國動畫電影在進行國際傳播時，應當更加重視文化負載詞的翻譯。

首先，應根據文化負載詞的類型選擇不同翻譯策略。對於人名、地名和具有高度文化專屬性的神話概念，可以適當採用音譯和文化保留；對於能夠通過英語直接表達的文化概念，可以使用直譯；對於習語和價值觀表達，則需要根據目的語語言習慣進行功能轉換。

其次，應避免過度歸化。中國電影走向海外並不意味著所有中國文化都需要變成西方觀眾熟悉的形式。如果將“昆侖”“太乙真人”等全部替換成西方神話概念，就可能導致文化身份的改變。

再次，也不能為了追求文化保留而忽視觀眾接受。如果某一文化負載詞的直譯會導致英語觀眾完全無法理解，那麼適當的意譯和功能

轉換仍然是必要的。

最後，字幕翻譯應充分利用電影的多模態特徵。影片畫面、音樂、人物動作等都能夠參與文化意義建構。因此，譯者不必試圖通過字幕文字解釋所有文化信息，而應該使字幕與視覺和聽覺信息形成互補。

13 結論

本文以《哪吒之魔童降世》英文字幕中的文化負載詞為研究對象，從文化傳播視角對其英譯方式進行了分析。通過對“混元珠”“靈珠”“魔丸”“天劫”“太乙真人”“昆侖十二金仙”“天庭”“龍宮”“山河社稷圖”“火尖槍”“師父”“仙術”“變化術”“我命由我不由天”等多個具體案例的分析，可以發現，該片字幕翻譯在處理文化負載詞時主要採用了直譯、意譯、音譯、文化保留、功能轉換和歸化等策略。

其中，直譯是影片神話文化負載詞處理中較為常見的方式。例如“Chaos Pearl”“Spirit Pearl”“Demon Pill”“dragon palace”等譯法具有較明顯的形式對應特徵。這種處理能夠在保證字幕簡潔性的同時保留源語文化概念。對於“Taiyi Zhenren”“Kunlun”等具有高度文化專屬性的名稱，字幕則更多採用文化保留策略，使目的語觀眾接觸到具有中國文化特色的專有表達。

另一方面，對於“山河社稷圖”“變化術”“降妖除魔”等表達，譯者更多考慮英語觀眾的即時理解，通過功能轉換和意譯降低文化理解障礙。這類處理雖然可能造成部分文化內涵損失，但能夠保證電影故事的連續性和可理解性。

其中，“我命由我不由天”的翻譯最能體現文化傳播中的複雜性。譯文“I am the master of my fate”弱化了“天”這一中國傳統文化意象，卻強化了“主體掌控命運”的現代價值觀。換言之，翻譯並沒有完全複製源語文化形式，卻成功傳遞了影片最核心的價值主題。這說明跨文化傳播中的有效翻譯並不一定等同於形式上的完全忠實，而應當在文化符號保留和文化功能傳遞之間尋找平衡。

總體來看,《哪吒之魔童降世》的字幕翻譯體現出較明顯的“保留與轉換並存”的特點。對於能夠代表中國文化身份的神話專名,譯者傾向於保留;對於影響觀眾理解的文化表達,則通過意譯和功能轉換降低文化障礙。這種策略總體上符合電影字幕翻譯的媒介特點,也與影片傳統文化現代化和國際傳播的總體目標相適應。

不過,文化負載詞的翻譯仍然存在不可避免的文化損失。由於不同文化之間缺少完全對應的概念,“Demon Pill”“dragon palace”等表達雖然能夠傳遞基本意義,但無法完整複製中國文化中的歷史聯想和神話意蘊。因此,字幕翻譯的文化傳播效果不能單純通過“詞語是否準確對應”來判斷,還應結合影片畫面、故事

情節、人物塑造以及觀眾的整體理解進行評價。

《哪吒之魔童降世》的案例說明,中國動畫電影要實現更加有效的國際傳播,需要同時重視內容創新和語言轉換。一方面,應通過現代化敘事使傳統文化產生新的生命力;另一方面,也應通過高質量字幕翻譯盡可能保留文化特色。對於英語翻譯研究而言,文化負載詞正是觀察這一過程的重要切入口。未來對於中國動畫電影字幕翻譯的研究,可以進一步擴大語料範圍,對不同國產神話動畫進行比較,並結合多模態翻譯理論研究字幕、畫面、音樂和人物動作之間的文化意義協同,從而更加全面地探討中國動畫電影的國際文化傳播問題。

參考文獻:

- [1] 趙夢越. 動畫電影的傳統文化創新與傳播——以《哪吒之魔童降世》為例[J]. 新疆新聞出版廣電, 2026, (6): 96-98.
- [2] 傅成宏. 現代影視再造中的中國故事與新故事——以《哪吒之魔童降世》為例[J]. 新楚文化, 2026, (16): 69-71.
- [3] 王苗. 中國傳統動畫題材的現代性重構——以《哪吒之魔童降世》為例[J]. 中國民族博覽, 2026, (4): 156-158.
- [4] 喬文麗. 《哪吒之魔童降世》的跨文化傳播[J]. 嘉應文學, 2026, (4): 151-153.
- [5] 鄭茜. 基於《功夫熊貓》與《哪吒之魔童降世》的傳統題材動漫創意研究[J]. 玩具世界, 2026, (1): 95-97.
- [6] 韓娜. 功能對等理論下 DeepSeek 機器翻譯與人工翻譯的博弈——以《哪吒之魔童降世》字幕翻譯為例[J]. 海外英語, 2026, (5): 1-5.
- [7] 李瑩瑩. 《哪吒之魔童降世》中視覺風格與東方美學的融合分析[J]. 玩具世界, 2026, (3): 74-76.
- [8] 尚永霞. 《哪吒之魔童降世》: 文化符號的深度剖析與價值彰顯[J]. 大眾文藝, 2025, (7): 63-65.
- [9] 梁冰. 皮爾斯符號學視域下的“反身份建構”——以動畫電影《哪吒之魔童降世》為例[J]. 文化學刊, 2025, (10): 71-74.
- [10] 劉佳靜, 曹靜儀. “哪吒”形象的演變機制與文化傳播研究——以《哪吒之魔童降世》《哪吒之魔童鬧海》為例[J]. 海河傳媒, 2025, (4): 69-75.

版權聲明

© 2026 作者版權所有。本文依據“知識共享署名 4.0 國際許可協議”(CC BY 4.0)以開放獲取方式發布。該許可允許使用者在任何媒介中自由使用、複製、傳播與改編文章(含商業用途),惟須明確署名

原作者及出處，並注明所作修改（如有）。完整協議詳見：<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deed.zh-hans>

出版聲明

所有出版物中的陳述、觀點及資料僅代表作者及供稿者個人立場，與 Brilliance Publishing Limited 及/或編輯人員無關。Brilliance Publishing Limited 及/或編輯人員對因內容所提及的任何理念、方法、說明或產品所導致的人身或財產損害概不負責。

DOI: 10.53104/dyshfzyj.2026.02.02.004

綠色消費態度與購買行為脫節的社會成因

姚慧¹

1. 廣東財經大學，廣東 廣州 510320

摘要：綠色消費已經成為公共生活中較容易被接受的價值表達。許多消費者認可環保、低碳和節約資源等理念，也願意在日常討論中支持綠色生活。但在真實購買場景中，綠色消費並不總能轉化為穩定行動。消費者面對商品價格、使用便利、產品品質、標籤可信度和既有消費習慣時，往往會重新作出取捨。綠色消費態度與購買行為之間的脫節，不能簡單理解為個人環保意識不足，它還受到生活成本、市場信息、平臺機制和社會支持條件的影響。本文從社會成因角度分析這一現象，認為價格壓力、便利性不足和綠色標籤信任不足，是影響綠色消費行動轉化的主要因素。綠色消費要從態度認同進入日常購買，不能只依賴消費者自覺，也需要企業提供真實清楚的綠色信息，平臺降低綠色選擇的操作門檻，公共政策和社區設施減少消費者的行動成本。

關鍵字：綠色消費；購買行為；態度行動脫節；生活成本；綠色標籤；社會支持

Social Causes of the Gap Between Green Consumption Attitudes and Purchasing Behavior

YAO Hui¹

1.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 Economics, Guangzhou 510320, P. R. China

Correspondence to: YAO Hui

Abstract: Green consumption has become a widely accepted idea in public life. Many consumers support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low-carbon living, and resource conservation, but this support does not always become real purchasing behavior. In actual consumption, people still need to consider price, convenience, product quality, green label credibility, and daily habits.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social causes of this gap. It argues that price pressure, limited convenience, and weak trust in green labels are important reasons why green consumption often remains at the level of attitude. To turn green attitudes into actual purchases, enterprises need to offer clearer green information, platforms should make green choices easier, and public policies should reduce the practical cost of green consumption.

Key words: green consumption; purchasing behavior; attitude-behavior gap; living costs; green labels; social support

引言

綠色消費已經不再是一個陌生概念。無論是日常購物、外賣點餐，還是家電更新、交通出行，消費者都會不斷接觸到環保、低碳、節能、

引用格式：姚慧. 綠色消費態度與購買行為脫節的社會成因[J]. 東亞社會發展研究, 2026, 2(2): 29-37.

可持續等表達[1]。很多人也認可這些理念，認為減少浪費、節約資源、選擇更環保的商品是有意義的。可到了具體購買時，情況往往沒有那麼簡單。消費者嘴上支持綠色消費，真正下單時卻可能仍然選擇更便宜、更方便、更熟悉的普通商品。

這種現象並不難理解。消費不是單純的價值表態，它還關係到價格、時間、習慣、信任和生活壓力。一個人可以認同環保理念，但如果綠色產品價格偏高、購買過程麻煩、標籤真假難辨，他就未必會把態度轉化為行動。綠色消費看起來是個人選擇，背後卻有很強的社會條件限制。把問題簡單說成消費者環保意識不足，並不能解釋這種態度和行為之間的落差。

現實生活中，這種落差十分常見。消費者願意支持減少一次性用品，但點外賣時未必會主動選擇“無需餐具”；消費者認可節能家電，卻可能因為價格原因推遲購買；消費者看到商品標注“綠色”“低碳”“環保”，也可能懷疑這只是商家的宣傳話術。綠色消費的困難，不在於消費者完全沒有態度認同，而在於這種認同經常被現實購買條件削弱。

本文圍繞“綠色消費態度與購買行為脫節的社會成因”展開分析。綠色消費的問題不能只從個人意識上解釋，還需要放到日常生活成本、購買便利性、市場信任和社會支持中理解。只有把這些條件看清楚，才能解釋為什麼很多消費者認可綠色消費，卻沒有形成穩定的購買行為。

1 綠色消費中的態度認同與行動落差

綠色消費在觀念層面並不難被接受。多數消費者都能理解環保、低碳、節約資源的意義，也願意在日常表達中支持綠色生活[2]。比如減少浪費、少用一次性用品、選擇節能產品、支持環保包裝，這些說法本身並不會引起太多反對。綠色消費已經帶有一定的正面價值，人們通常也願意把它看作一種更負責任的生活方式。

但消費行為和價值態度並不是一回事。消費者真正購買商品時，面對的不是抽象的環保

理念，而是具體價格、商品品質、使用便利、品牌熟悉度和售後風險[3]。一個人可以認可綠色產品更有社會價值，但在付款時仍然會比較價格；也可以支持低碳生活，但在時間緊張時仍然選擇更方便的交通或外賣服務。綠色態度進入消費場景後，會被許多現實因素重新篩選。

這種落差在日常生活中很常見。消費者可能支持減少一次性餐具，但點外賣時並不會每次都主動選擇“無需餐具”；可能認可節能家電，卻因為價格較高而繼續使用舊產品；可能願意購買環保商品，但看到“綠色”“天然”“低碳”等標籤時，又擔心只是商家宣傳。綠色消費並不是沒有觀念基礎，而是這種觀念常常沒有足夠力量改變原有消費選擇。

這裡需要避免把問題簡單歸結為消費者“不夠自覺”。消費行為帶有很強的生活慣性，人們平時更容易選擇熟悉、方便、價格合適的商品。綠色消費如果需要額外付費、額外判斷、額外操作，就很難成為穩定行動。消費者的態度認同是真實存在的，但它並不必然轉化為購買行為。態度和行動之間的距離，正是理解綠色消費困境的起點。

2 生活成本壓力下的綠色購買猶豫

綠色消費進入真實購買場景後，最先遇到的往往是價格問題。消費者支持環保理念，並不代表他願意在每一次購買中承擔更高成本[4]。對很多普通家庭來說，消費選擇首先要滿足生活需要，再考慮商品背後的環保價值。綠色消費如果被消費者理解為“更貴的選擇”，態度認同就很容易停在觀念層面。

2.1 綠色產品的價格感知偏高

綠色產品常常帶有較高的價格印象。綠色食品、節能家電、環保清潔用品、可降解包裝商品，都容易讓消費者產生“環保但更貴”的判斷。有些產品確實因為原料、認證、生產流程和供應鏈成本較高，價格高於普通產品。也有一些商品實際差價並不大，但只要貼上“綠色”“有機”“低碳”“環保”等標籤，消費者就會下意識地把它和高價格聯繫起來。

價格感知並不完全來自真實價格，也來自消費者對綠色產品的整體印象。很多消費者會

把綠色產品和“高端”“精緻”“小眾”聯繫在一起，覺得它不是普通生活必需品，而是有一定經濟餘力後才會考慮的選擇。這樣的印象一旦形成，即使部分綠色產品價格已經下降，消費者也可能先入為主地認為“不划算”。綠色消費在進入購買環節前，已經被價格印象擋住了一部分。

這種價格感知會直接影響購買行為。消費者在日常購物時，很少只根據價值理念作決定，更多時候會比較價格、容量、耐用性和性價比。綠色產品如果不能讓消費者清楚看到實際好處，只強調環保意義，就很難讓人願意多付錢。比如同樣是清潔用品，如果普通產品價格更低、效果更熟悉，消費者就可能放棄環保款。並不是他不認同環保，而是綠色價值在具體付款時不夠直接。

綠色產品的價值也不總是馬上可見。普通商品的效果往往比較直接，買來就能使用，價格和功能容易比較。綠色產品的環保價值卻常常發生在生產、運輸、節能或回收環節，消費者不一定能立刻感受到。看不見的環保收益，遇到看得見的價格差異，就很容易被弱化。消費者並不是不承認綠色價值，而是很難在付款時把它放到最前面。

價格感知還會放大消費者對風險的擔心。綠色產品價格較高時，消費者會更在意它是否真的好用，是否值得購買，是否只是商家借環保概念提高售價。尤其在綠色標籤較多、說明不夠清楚的情況下，價格越高，消費者越容易謹慎。綠色消費本來需要一定信任，如果價格又明顯高出普通商品，購買猶豫就會更強。

綠色消費不能只靠道德認同來推動。消費者可以在態度上支持環保，但在購買時仍然要面對家庭預算和生活成本。綠色產品如果長期保持“高價”“高端”“小眾”的形象，就很難成為普通人的日常選擇。只有當綠色產品的價格更加接近普通商品，或者消費者能明確感受到節能、耐用、安全等實際收益時，綠色態度才更容易轉化為購買行為。

2.2 環保價值讓位於日常預算

綠色消費的價值往往比較長遠，而日常預算的壓力卻很直接。消費者知道節能家電可以

減少能源消耗，也知道環保產品對資源節約有意義，但這些收益並不一定馬上顯現。購買時真正擺在眼前的，是商品價格、當月支出和家庭現金流。環保價值越抽象，預算壓力越現實，消費者就越容易把綠色消費往後放。

普通家庭的消費選擇通常帶有明顯的優先順序。食品、住房、交通、教育、醫療等支出更難壓縮，綠色產品如果價格偏高，就會被看成“可以支持，但不一定現在購買”的選項。尤其在收入預期不穩定或生活成本較高時，消費者更傾向於選擇價格低、功能夠用、風險較小的商品。綠色消費在這種情況下很難成為優先安排。

日常預算對消費行為的約束，比環保理念更直接。消費者每天面對的是具體帳單，而不是抽象的環境目標。買普通商品可以馬上省下部分錢，購買綠色商品帶來的環境收益卻比較分散，也不一定由消費者本人直接感受到。對很多家庭來說，這種取捨並不複雜。環保產品可以被認可，但低價產品更容易被購買。

這種情況在大件消費中更明顯。節能家電、環保傢俱、新能源產品往往具有長期節約和環境友好價值，但一次性支付金額較高。消費者即使知道長期看可能更划算，也會受到當下預算影響。尤其在舊產品還能繼續使用時，很多人會選擇暫緩更新。綠色消費在這裡不是沒有吸引力，而是被現實支出節奏壓住了。

綠色智能家電以舊換新政策能說明這個問題。相關部門推動消費品以舊換新，並鼓勵有條件的地方對消費者購買綠色智能家電給予補貼，目的之一就是降低消費者的換新門檻[5]。消費者並非完全不願意選擇節能、智能、環保的家電產品，只是如果一次性支出較高，購買行動就容易被推遲。補貼和回收安排把部分成本降下來，綠色購買才更容易發生。

對很多人來說，環保是一種值得支持的價值，但家庭預算才是每天都要面對的約束。綠色產品如果長期保持高價形象，或只能被中高收入群體穩定消費，它就很難真正進入大眾日常生活。要讓綠色態度轉化為購買行為，不能只強調“應該買綠色產品”，還要讓消費者覺得買得起、用得上、不會增加太多生活負擔。

3 便利性不足與日常消費習慣

綠色消費能不能發生，不只取決於消費者是否認同環保，也取決於它在日常生活中是否方便。很多綠色選擇並不複雜，但它們常常需要消費者多花一點時間、多做一個判斷，或者改變已經熟悉的消費路徑。對消費者來說，日常消費本來就帶有很強的即時性。買東西、點外賣、出門通勤、處理快遞包裝，很多決定都是在短時間內完成的。綠色選擇如果不能自然嵌入這些場景，就很容易被忽略。

3.1 綠色選擇增加時間與操作成本

綠色消費往往要求消費者承擔額外的操作成本。比如購物時要記得自帶環保袋，點外賣時要主動選擇“無需餐具”，購買商品時要查看是否有環保認證，處理快遞包裝時還要判斷能否回收。這些事情單獨看都不難，但放進快節奏的日常生活中，就會變成額外負擔。消費者可能願意支持環保，但不一定願意在每一次消費中都停下來做選擇。

很多綠色行為看起來只是多一個步驟，但這個步驟會反復出現在日常生活中。一次選擇“無需餐具”並不困難，一次查看綠色認證也不複雜，可消費者每天要面對大量類似選擇。買菜、網購、點餐、出行、處理垃圾，每個環節都要求多判斷一次，綠色消費就會從價值選擇變成生活負擔。次數多了，消費者自然會傾向於省掉這些步驟。

這種操作成本會影響綠色行為的穩定性。綠色消費不是一次表態，而是反復發生的日常行為。一次自帶購物袋不難，長期堅持才難；偶爾選擇環保包裝不難，每次下單都主動選擇才難。消費者在時間緊張、注意力分散或購買任務較多時，往往會回到最熟悉、最省事的方式。環保態度還在，但行動被生活節奏擠到後面。

外賣平臺的“無需餐具”功能可以說明這一點。消費者點外賣時，並不一定反對減少一次性餐具，關鍵在於平臺是否把這個選擇放在順手的位置[6]。如果“無需餐具”只是一個不顯眼的選項，很多人可能不會特意去找；如果它被放進下單流程，並配合提醒或積分激勵，用戶選擇的可能性就會提高。這個例子說明，

綠色消費不是只靠消費者主動克服麻煩，也需要消費場景本身降低行動門檻。

便利性不足還會讓綠色消費帶有“額外任務”的感覺。消費者原本只是想完成一次購買，但綠色選擇要求他多比較、多判斷、多操作。時間久了，綠色消費就容易被看作麻煩事，而不是自然的生活方式。綠色選擇只有更容易被看見、更容易完成，也更少打斷原有消費流程，才可能真正進入日常購買。

3.2 消費習慣削弱持續行動

消費行為帶有很強的慣性。人們平時購物、點餐、通勤和處理生活用品時，往往會沿用最熟悉的方式。熟悉的品牌、常用的平臺、固定的購買路徑，會讓消費決定變得更快，也更省心。綠色消費如果沒有進入這些固定習慣，就很難長期穩定下來。消費者可能偶爾會因為宣傳提醒選擇環保商品，但過了一段時間，又會回到原來的購買方式。

這種習慣並不只是個人懶惰造成的。現代消費場景本身就強調效率和即時滿足。電商平臺會推送滿減商品，外賣平臺強調配送速度，線下便利店突出即買即走。消費者在這些場景中形成的習慣，是快速比較、快速下單、快速使用。綠色消費往往要求人們多考慮一步，比如包裝是否環保、商品是否低碳、舊物是否可以回收。這個“多一步”在觀念上不難接受，在實際生活中卻容易被省掉。

平臺機制也會強化原有消費習慣。電商頁面常常突出銷量、價格、優惠券和配送速度，消費者很容易順著這些信息完成購買。綠色屬性即使存在，也經常不是最醒目的內容。久而久之，消費者會習慣按照價格和便利作出選擇，而不是主動尋找環保信息。綠色消費如果在平臺展示中處於邊緣位置，就很難進入穩定購買路徑。

家庭消費習慣也會影響綠色行動。很多家庭購買商品時，最先考慮的是價格、耐用、方便和家人是否習慣使用。即使家庭成員中有人更支持綠色消費，也未必能改變整體購買方式。比如環保清潔用品價格偏高，家人覺得普通產品已經夠用，購買者就可能放棄綠色選擇。綠色消費如果只是個人偏好，而沒有變成家庭共

同習慣，就很難持續。

還有一些綠色行動需要長期重複，短期內看不到明顯回報。減少一次性用品、堅持垃圾分類、購買節能產品、參與舊物回收，都不是一次購買就能完成的事情。消費者剛開始可能比較積極，但如果過程麻煩、回饋不明顯、周圍人參與不多，行動熱情就會慢慢下降。綠色消費的難點正在這裡：它不只是讓消費者“願意做一次”，還要讓消費者“願意一直做”。

消費習慣一旦形成，就不容易靠宣傳改變。環保口號可以提醒消費者，但提醒的作用往往是短暫的[7]。消費者回到具體場景中，仍然會受時間、價格、平臺推薦和家庭需要影響。綠色消費要變成日常行為，不能只靠一次活動或一次宣傳，而要讓綠色選擇反復出現在普通消費流程裡。綠色選擇變得熟悉後，才有可能成為習慣的一部分。

4 綠色標籤泛化與市場信任不足

綠色消費能否轉化為購買行為，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消費者是否信任市場提供的信息。消費者願意為綠色產品支付更高價格，或者願意改變原有消費習慣，前提是他相信這種選擇確實有環保意義。如果綠色標籤含義不清，環保承諾難以核實，商家宣傳又帶有明顯營銷色彩，消費者就會產生猶豫。綠色消費並不只是價格問題和便利問題，它還涉及市場信任。

在現實消費場景中，綠色信息往往並不容易判斷。普通消費者很難看懂產品從原料、生產、包裝、運輸到回收各環節的環境影響，也不可能每次購買都去核對完整認證材料。大多數時候，消費者只能依賴商品包裝、平臺頁面、廣告話術和認證標識來判斷產品是否綠色。也正因為如此，綠色標籤越是被頻繁使用，消費者越容易對其真實性產生懷疑。標籤本來應該幫助消費者降低判斷成本，但當標籤過多、含義過寬時，它反而會增加選擇困難。

4.1 綠色概念被營銷話術稀釋

綠色概念原本指向資源節約、環境友好和低碳轉型。它應當和真實的生產方式、材料選擇、包裝減量、能源消耗、回收處理等內容聯繫在一起。可是進入商業宣傳後，綠色概念很容

易被包裝成一種銷售語言。許多商品都會在包裝、廣告和詳情頁中突出“綠色”“低碳”“環保”“天然”“可持續”等字眼，但這些詞語有時只停留在表達層面，並沒有說明產品到底在哪些方面更綠色。

這種模糊表達會削弱綠色信息的解釋力。消費者看到“環保”兩個字，未必知道它指的是包裝可回收，還是生產過程減少了污染；看到“低碳”標籤，也不一定清楚低碳發生在哪個環節，是製造環節、運輸環節，還是使用過程。綠色消費需要具體信息支撐，如果商家只給出寬泛詞語，不解釋背後的標準和依據，消費者就很難把這些宣傳轉化為購買信心。

綠色話術過度使用後，還會讓消費者產生審美疲勞。過去“綠色”可能意味著某種差異化優勢，但當越來越多商品都聲稱自己環保時，這個概念就會變得普通。不同品牌使用相似表達，消費者卻看不出它們之間有什麼實質區別。綠色標籤越多，反而越難突出真正有環保價值的產品。消費者面對大量相似宣傳時，可能不再認真分辨，而是直接把它們看成商家促銷的一部分。

“漂綠”現象也加重了這種不信任。現實中，一些企業會強調自身環保形象，卻沒有提供足夠證據說明產品或經營活動真的減少了環境影響[8]。比如商品只是在包裝上使用綠色顏色、自然圖案或環保口號，卻沒有說明材料是否可回收、生產是否節能、廢棄後如何處理。消費者一旦發現綠色宣傳和實際體驗之間存在落差，就會對類似產品保持警惕。一次不信任，可能會影響後續很多次購買判斷。

綠色概念被營銷話術稀釋後，消費者的購買猶豫就會變得更強。綠色產品往往需要消費者付出更高價格，或者至少需要花時間進行比較。如果消費者不能確認產品是否真的更環保，他就沒有足夠理由為它多付錢。這裡的關鍵不在於消費者是否支持環保，而在於他能不能相信自己的購買選擇確實有意義。環保態度是真實的，但市場信息不可靠時，態度很難落到行動上。

這種情況對真正重視環保的企業也不利。那些認真改進生產、減少包裝、完善回收的企

業，可能會被大量模糊宣傳淹沒。消費者無法區分真實綠色改進和普通營銷包裝，就會把兩者混在一起看待。市場中如果缺少清楚標準和有效識別機制，綠色消費就容易陷入信任困境。消費者不是不願意支持綠色產品，而是不確定自己支持的物件是否可靠[9]。

綠色標籤的泛化、綠色概念的濫用、環保信息的不透明，都會讓消費者在購買時保持距離。很多消費者並不是排斥綠色產品，而是不確定這些產品是否真的值得信任。產品為什麼綠色、綠色在哪裡、有沒有可靠證明，這些問題如果說不清，綠色標籤就很難成為購買理由。

4.2 認證信息不清加重購買疑慮

綠色消費需要信息支撐。消費者願意選擇綠色產品，前提是他能夠看懂產品為什麼綠色，也能判斷相關說明是否可靠。現實中，很多商品雖然標注了環保、低碳、節能、有機、可回收等信息，但這些信息並不總是清楚。消費者看到標籤時，未必知道認證來自哪裡，標準是什麼，認證範圍包括哪些環節。綠色信息一旦難以理解，購買信心就會受到影響。

認證信息不清，最直接的問題是增加判斷成本。普通消費者並不是專業檢測人員，也很少有時間去查找認證標準。買一件日用品時，他通常只會看價格、品牌、用途和評價。如果綠色認證需要額外識別，甚至需要進入多個頁面查看說明，很多消費者就會放棄進一步判斷。綠色消費本來應該降低環境負擔，卻在購買過程中增加了認知負擔。

不同類型的綠色標識也容易讓消費者混淆。有的標籤強調節能，有的強調材料安全，有的強調包裝可回收，有的強調碳排放減少。這些內容雖然都和綠色消費有關，但含義並不相同。消費者如果分不清這些標識之間的差別，就很難判斷某個產品到底在哪方面更綠色。比如一件商品使用可回收包裝，並不等於它的生產過程低碳；一件產品節能，也不一定代表它在材料使用上更環保。認證信息如果不夠清楚，綠色標籤就容易被消費者看成一類模糊符號。

認證主體的可信度也會影響購買判斷。有些認證來自較為正式的機構，有些只是企業自我聲明，還有一些只是平臺頁面上的宣傳標識。

消費者在短時間內很難區分這些信息的權威程度。若企業只是寫著“環保材料”“綠色配方”“低碳製造”，卻沒有說明檢測依據和認證來源，消費者就會擔心這些表述只是商家自己說的。綠色產品價格往往高於普通商品，認證越不清楚，消費者越不願意承擔這部分溢價。

平臺展示方式也會影響認證信息的有效性。電商頁面上，綠色信息有時被放在商品詳情的靠後位置，或者夾在大量營銷語、優惠信息和用戶評價中。消費者如果想確認一個產品是否真正綠色，需要自己翻找材料說明、檢測報告和認證編號。這樣的設計並不利於綠色消費。綠色信息如果不夠醒目、不夠簡潔、不夠容易核驗，就很難在購買決定中發揮作用。

認證信息不清還會帶來一種更深的懷疑：消費者擔心自己只是為“綠色形象”付費，而不是為真實環保價值付費。綠色產品往往包含一定道德意義，消費者購買時不僅是在買商品，也是在表達某種生活態度。可如果認證依據模糊，消費者就會覺得這種表達可能被商家利用。這樣的疑慮一旦形成，綠色消費就不再是積極選擇，而變成需要反復確認的風險選擇。

這種疑慮會影響消費者對整個綠色消費市場的看法。個別商品認證不清，可能只會影響一次購買；如果類似情況經常出現，消費者就會對同類綠色產品都保持謹慎。市場信任被削弱後，真正有環保價值的產品也會受到影響。消費者無法區分真實認證和普通宣傳，只能用更保守的方式保護自己。結果是綠色態度仍然存在，但購買行為變得遲疑。

要減少這種疑慮，綠色認證需要更加清楚，也需要更貼近普通消費者的理解方式。消費者不一定需要看到複雜的技術說明，但需要知道產品的綠色價值來自哪裡，是節能、減排、可回收，還是材料更安全。認證來源、認證範圍和核驗方式也應當更容易找到。綠色信息如果能被普通消費者快速理解，綠色標籤才更可能成為購買理由，而不是新的疑問。

5 社會環境對綠色行動的支撐不足

綠色消費看起來是個人購買行為，但它並不是完全由個人態度決定的。消費者是否選擇

綠色產品，往往還受到平臺規則、社區設施、家庭觀念和公共服務條件的影響。如果周圍環境並不支持綠色行動，個人即使有環保意識，也很難長期堅持。很多綠色消費之所以停留在態度層面，不是因為消費者完全不願意做，而是因為現實環境沒有給出足夠便利的支持。

平臺消費場景對綠色行動影響很大。現在很多消費都發生在電商平臺、外賣平臺和即時零售平臺中，頁面上最醒目的信息常常是價格、銷量、優惠券、配送速度和用戶評價。綠色屬性即使存在，也可能被放在不太顯眼的位置。消費者在快速流覽商品時，往往會順著平臺設置好的路徑完成購買。平臺強調什麼，消費者就更容易看見什麼；綠色選項如果長期處在邊緣位置，就很難成為購買時的主要考慮。

社區環境也會影響綠色消費能否持續。比如垃圾分類、舊物回收、快遞包裝回收、廢舊家電回收，都需要相應的設施和管理安排。如果回收點距離遠、開放時間不穩定、分類規則不清楚，居民即使願意參與，也會覺得麻煩。很多綠色行為不是買完商品就結束，還涉及後續處理。沒有方便的社區回收和處理管道，消費者前面的綠色態度就很容易在生活細節中被消耗掉。

家庭內部的消費觀念也會削弱綠色行動。家庭購買往往不是一個人的決定，而是多個成員共同形成的生活習慣。有人願意選擇綠色產品，但其他家庭成員可能更看重價格、耐用、方便和熟悉程度。比如環保清潔用品價格較高，家人覺得普通產品已經夠用，購買者就可能放棄綠色選擇。綠色消費如果只是個體態度，沒有變成家庭共同接受的生活方式，就很難穩定下來。

公共支持不足還會讓綠色消費帶有額外負擔。綠色交通需要更方便的公共交通和騎行環境，綠色包裝需要商家和平臺共同配合，舊物回收需要明確管道，綠色產品推廣也需要標準和監管。如果這些條件沒有跟上，綠色消費就容易被轉化為個人責任。消費者被要求少用、少買、多分類、多判斷，卻沒有獲得相應的便利條件，時間久了自然會產生疲憊感。

社會環境對綠色消費的影響還體現在價值

氛圍上。如果綠色消費只是宣傳口號，而日常生活中仍然以低價、速度和即時滿足為主要標準，消費者的行為選擇就很難改變。比如平臺促銷不斷刺激囤貨，外賣和快遞追求速度，社交媒體又不斷製造新的消費需求，這些都會強化高頻消費和即時消費。綠色消費要求克制和選擇，但周圍環境卻在不斷鼓勵更快、更多、更便宜的購買，兩者之間本身就存在張力。

綠色行動需要被放進具體生活場景中理解。消費者的態度固然重要，但平臺是否提供清楚入口，社區是否有便利設施，家庭是否支持綠色選擇，公共政策是否降低行動成本，都會影響綠色消費能否真正發生。個人環保意識如果缺少外部條件配合，就很容易變成一種停留在觀念層面的認同。

6 綠色消費行動轉化的支持條件

綠色消費要從態度認同走向購買行為，不能只依靠消費者個人自覺。前文提到的價格壓力、便利性不足、標籤信任問題和社會環境支撐不足，都說明綠色消費並不是單純的個人選擇。消費者可以認可環保價值，但如果綠色產品價格偏高、購買過程麻煩、認證信息模糊，行動就很難穩定。綠色消費需要被放到更完整的社會條件中理解。

企業應當減少模糊的綠色宣傳，把綠色信息說得更清楚。消費者真正需要的不是大量“綠色”“低碳”“環保”字樣，而是能夠看懂的產品說明。比如產品在哪個環節減少了資源消耗，包裝是否可回收，節能效果如何，認證來自哪裡。這些信息如果表達清楚，消費者才更容易判斷綠色產品是否值得購買。綠色宣傳不能只停留在形象包裝上，也不能把環保概念當作普通營銷詞使用。

平臺也需要降低綠色選擇的操作門檻。電商、外賣和即時零售平臺已經深度影響消費者的購買路徑，平臺頁面如何展示信息，會直接影響用戶看見什麼、選擇什麼。如果綠色商品、環保包裝、無需餐具、舊物回收等選項被放在很深的位置，消費者即使有環保態度，也可能因為沒有注意到而放棄。綠色選擇如果能被放進普通下單流程，操作變得簡單，消費者就不

需要額外花費太多精力。

公共政策和社區設施也要提供支撐。綠色消費不只是購買綠色商品，還涉及回收、分類、再利用和後續處理。廢舊家電回收、快遞包裝回收、垃圾分類、綠色出行等行為，都需要相應的公共設施配合。如果居民找不到方便的回收管道，或者分類規則經常變化，綠色行動就容易中斷。公共支持的意義就在於減少個人承擔的行動成本，讓綠色消費不再只是少數人願意堅持的選擇。

價格支持也很重要。綠色產品如果長期給人“更貴”的印象，就很難進入普通家庭的日常消費。適當的補貼、以舊換新、綠色產品優惠和回收激勵，可以降低消費者的購買壓力。消費者並不是完全不願意選擇環保產品，但在生活成本較高的情況下，價格差異會影響實際行動。綠色消費要擴大，就需要讓消費者覺得這種選擇並不會明顯增加生活負擔。

參考文獻：

- [1] 國家發展改革委，工業和信息化部，住房和城鄉建設部，等。關於印發《促進綠色消費實施方案》的通知：發改就業〔2022〕107號[Z]。2022-01-18。
- [2] Peattie K. Green Consumption: Behavior and Norms[J]. *Annual Review of Environment and Resources*, 2010, 35: 195-228.
- [3] Kollmuss A, Agyeman J. Mind the Gap: Why Do People Act Environmentally and What Are the Barriers to Pro-Environmental Behavior?[J].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Research*, 2002, 8(3): 239-260.
- [4] Joshi Y, Rahman Z. Factors Affecting Green Purchase Behaviour and Future Research Directions[J]. *International Strategic Management Review*, 2015, 3(1-2): 128-143.
- [5] 商務部等14部門。關於印發《推動消費品以舊換新行動方案》的通知[Z]。2024-03-27。
- [6] 經濟參考網。超2億外賣用戶使用“無需餐具” 美團“青山計劃”發布綠色低碳新目標[N/OL]。2022-08-31。
- [7] White K, Habib R, Hardisty D J. How to SHIFT Consumer Behaviors to Be More Sustainable: A Literature Review and Guiding Framework[J]. *Journal of Marketing*, 2019, 83(3): 22-49.
- [8] Delmas M A, Burbano V C. The Drivers of Greenwashing[J]. *California Management Review*, 2011, 54(1): 64-87.
- [9] Lyon T P, Montgomery A W. The Means and End of Greenwash[J]. *Organization & Environment*, 2015, 28(2): 223-249.

綠色消費的行動轉化，還需要更穩定的社會氛圍。宣傳環保當然有必要，但宣傳不能只停留在道德勸說上。過度強調個人責任，容易讓消費者產生壓力，也容易讓綠色消費變成一種負擔。更有效的方式，是讓綠色選擇逐漸進入普通生活場景。購物時容易識別綠色產品，點外賣時容易減少一次性餐具，處理舊物時容易找到回收管道，消費者才更可能把環保態度變成日常習慣。

綠色消費態度與購買行為之間的距離，並不是無法縮小。關鍵在於讓綠色消費變得可信、方便、負擔得起。消費者的環保意識需要被尊重，但不能把全部責任都壓在消費者身上。企業、平臺、社區和公共政策共同降低行動門檻，綠色消費才有可能從一種被認可的態度，逐步轉化為穩定的購買行為。

版權聲明

© 2026 作者版權所有。本文依據“知識共享署名 4.0 國際許可協議”（CC BY 4.0）以開放獲取方式發布。該許可允許用戶在任何媒介中自由使用、複製、傳播與改編文章（含商業用途），惟須明確署名原作者及出處，並注明所作修改（如有）。完整協議詳見：<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deed.zh-hans>

出版聲明

所有出版物中的陳述、觀點及資料僅代表作者及供稿者個人立場，與 Brilliance Publishing Limited 及/或編輯人員無關。Brilliance Publishing Limited 及/或編輯人員對因內容所提及的任何理念、方法、說明或產品所導致的人身或財產損害概不負責。

DOI: 10.53104/dyshfzyj.2026.02.02.005

青年“搭子”社交中的關係變遷與情感需求研究

吳陽¹

1. 安徽工業大學，安徽 馬鞍山 243032

摘要：近年來，“搭子”逐漸成為青年群體日常社交中的高頻詞彙。從飯搭子、旅遊搭子到運動搭子、學習搭子，這種圍繞具體活動和興趣需求形成的新型關係，正在改變傳統青年交往方式。與以長期信任、穩定陪伴為基礎的傳統關係相比，搭子關係具有目標明確、邊界清晰、投入較低和靈活性較強等特點。它既滿足了青年在快節奏生活中的陪伴需求，也反映出當代青年面對社會流動、生活壓力和數字媒介環境變化時形成的新型社交策略。本文以青年搭子社交為研究物件，採用文獻分析法，對搭子社交產生的社會背景、關係特徵和情感需求進行分析。文章認為，搭子社交並不是簡單意義上的“淺社交”或傳統關係的削弱，而是青年在新的社會環境中對人際關係進行重新調整的一種方式。青年通過搭子關係降低社交成本，提高交往效率，同時獲得階段性的情感支持和身份認同。但由於搭子關係具有較強的功能屬性，也可能造成關係持續性不足、情感支持有限以及社交深度下降等問題。未來青年社交的發展並非否定搭子模式，而是在保持輕量連接優勢的基礎上，推動淺層關係向更穩定、更具情感價值的關係轉化。

關鍵字：青年群體；搭子社交；關係變遷；情感需求；數字社交

Research on Relationship Transformation and Emotional Needs in Young People's “Da Zi” Socializing

WU Yang¹

1. Anhu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Ma'anshan 243032, P. R. China

Correspondence to: WU Yang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Da Zi” has gradually become a popular term in young people's daily social interactions. From meal companions and travel companions to exercise partners and study partners, this new type of relationship formed around specific activities and shared interests is changing traditional patterns of youth interaction. Compared with conventional relationships based on long-term trust and stable companionship, “Da Zi” relationships are characterized by clear purposes, defined boundaries, lower levels of commitment, and greater flexibility. They not only satisfy young people's need for companionship in fast-paced lifestyles but also reflect new social strategies developed by young people in response to social mobility, life pressures, and changes in digital media environments. This paper takes young people's “Da Zi” socializing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nd adopts a literature analysis approach to examine its social background, relationship characteristics, and emotional needs. It argues that “Da Zi” socializing should not simply be regarded as “shallow socializing” or the decline of traditional relationships, but rather as a way for young people to reorganize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under new social conditions. Through “Da Zi” relationships, young people reduce social costs, improve interaction

引用格式：吳陽. 青年“搭子”社交中的關係變遷與情感需求研究[J]. 東亞社會發展研究, 2026, 2(2): 38-45.

efficiency, and obtain temporary emotional support and identity recognition. However, due to the strong functional orientation of these relationships, they may also lead to insufficient relationship continuity, limited emotional support, and weakened social depth.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youth social interaction does not require rejecting the “Da Zi” model, but rather transforming superficial connections into more stable and emotionally meaningful relationships while maintaining the advantages of flexible social connections.

Key words: young people; “Da Zi” socializing; relationship transformation; emotional needs; digital social interaction

引言

社交關係一直是社會科學關注的重要議題。傳統社會中的人際關係通常建立在家庭、地域、學校和工作組織等穩定結構之上，關係形成具有較強的持續性和身份綁定特點。隨著社會流動速度加快，青年生活空間不斷擴大，工作學習環境更加開放，傳統關係模式逐漸無法完全滿足青年對於陪伴、交流和情感支持的需求。

近年來，“搭子”成為青年網絡生活中的流行表達。“飯搭子”“旅遊搭子”“健身搭子”“學習搭子”等詞語不斷進入日常交流場景。“搭子”這一概念原本具有較強的口語色彩，而在網絡環境中逐漸發展為一種描述特定社交關係的新表達。研究指出，“xx 搭子”通常表示圍繞某項具體活動形成的臨時夥伴關係，其核心特點是需求明確、關係輕量化以及連接目的較為清晰。

青年群體對於搭子關係的接受，反映出社會交往方式正在發生變化^[1]。過去，人們往往期待通過一次關係建立獲得較為完整的人際連接，例如成為朋友意味著共用多個生活領域。但搭子關係改變了這一邏輯，它不再要求雙方全面瞭解，而是圍繞某個具體需求建立聯繫。例如，一個青年可能需要一個共同運動的人，卻不一定希望進入對方完整的私人生活。這種關係降低了交往壓力，也給予個體更多選擇空間。已有研究從不同角度討論了搭子社交現象。有研究認為，搭子社交體現了青年面對現代生活壓力時形成的策略性連接方式，並非簡單的社交冷漠，而是個體在不確定環境中的適應方式。也有研究指出，搭子關係能夠滿足青年陪

伴、安全等需求，但存在情感支持不足、關係深入困難等問題。不過，現有討論中仍存在兩個不足。一類研究較關注搭子社交的形成原因，將其視為數字媒介環境下的新型交往現象；另一類研究更多強調搭子社交可能帶來的風險，例如關係工具化、情感弱化等。相比之下，青年為何需要搭子、搭子關係如何改變青年對於社交的理解，以及搭子與傳統關係之間如何共存，仍值得進一步分析。

搭子社交的出現並不是青年不需要關係，而是青年對於關係形式提出了新的要求。現代青年並沒有放棄情感連接，而是在尋找一種更加符合現實生活節奏的連接方式。搭子關係正是在這一背景下產生，它體現了青年從“尋找穩定關係”向“尋找適配關係”的轉變。

1 青年“搭子”社交的產生背景

1.1 生活節奏變化推動社交方式調整

現代青年面對的生活環境具有較強的不確定性。學習、就業、城市遷移等因素，使青年經常處於不斷變化的社會空間之中。傳統依靠長期共同生活形成的關係網絡，在流動環境下難以持續發揮作用。現代性轉型背景下，青年社交呈現碎片化特點，搭子關係成為青年在碎片化生活中重新組織社會連接的一種方式^[2]。這一觀點說明，搭子並不是孤立產生的網絡現象，而與青年生活結構變化存在聯繫。現實生活中，青年經常面臨“想社交但沒有時間”“需要陪伴但不想承擔過高關係壓力”等矛盾。例如，剛進入城市生活的青年可能希望有人一起吃飯、看電影或參加活動，但由於工作節奏較快，很難建立穩定朋友關係。搭子提供了一種較低成本的解決方式。這種關係並不要求雙方快速

進入深層交往，而是允許個體根據當前需求建立聯繫。對於青年而言，這種靈活性降低了社交失敗帶來的心理壓力。

1.2 數位平臺改變關係建立方式

數字媒介的發展改變了青年尋找關係的路徑。過去，人際關係更多依靠現實空間中的偶遇和長期互動形成，而現在，青年可以通過社交平臺、興趣社區和網絡群組主動尋找具有共同需求的人。平臺連接機制使尋找搭子成為一種可操作的媒介實踐^[2]，平臺推送、興趣標籤等功能改變了人與人建立聯繫的方式。數字平臺降低了尋找同類關係的成本。例如，一名青年想尋找旅行夥伴，可以通過網絡發佈需求，並快速找到具有相似目的的人。這種匹配方式提高了社交效率，也使關係建立更加直接。但數位平臺也改變了關係判斷標準。傳統關係往往需要經過長期相處，而搭子關係更多依靠興趣、目標和短期需求進行匹配。這使青年更加重視“是否合適”，而不是單純關注“認識多久”。

1.3 青年情感需求的變化

搭子社交流行的根本原因，不只是技術變化，更與青年情感需求變化有關。現代青年並不是缺少社交機會，而是在面對複雜關係時產生新的選擇傾向。傳統關係通常包含較多責任和情感投入，例如朋友之間需要持續聯繫，需要回應彼此生活變化。而搭子關係減少了這種壓力，使青年能夠在保持個人空間的同時獲得陪伴。謝世堅、張麗媛指出，“xx 搭子”的出現體現了人與人連接方式從“以關係為主”向“以事為主”的變化。這一變化說明，青年社交並非減少，而是在重新定義關係價值。對於當代青年而言，理想關係並不一定意味著高度綁定，而可能是一種能夠提供支持，同時尊重邊界的關係模式。搭子正好滿足了這種需求。

2 青年“搭子”社交中的關係變遷

“搭子”社交的出現，並不只是增加了一種新的社交稱謂，更重要的是改變了青年理解和建立關係的方式。傳統關係強調穩定性和持續性，而搭子關係強調適配性和情境性。青年不再單純追求“一種關係滿足所有需求”，而是根據不同生活場景建立不同類型的連接。這

種變化並不意味著青年拒絕深度關係，而是說明青年正在重新劃分關係功能。在過去，一個朋友可能同時承擔陪伴、娛樂、情感支持、信息交流等多重功能。而現在，一個青年可能擁有不同領域的搭子：有人負責運動，有人負責旅行，有人負責學習交流。不同關係承擔不同任務，形成更加細分化的人際網絡。

2.1 從熟人關係到興趣連接

傳統社會中的人際交往往往受到家庭、地域和單位等因素影響。人們通常先進入某個固定社會圈，再在圈內發展關係。這種關係具有較強的穩定性，但選擇空間相對有限。青年搭子社交改變了這一模式。青年不一定需要先成為朋友，再尋找共同活動，而是可以因為共同需求直接建立聯繫。例如，兩個陌生人因為喜歡徒步而成為“徒步搭子”，因為準備考試而成為“學習搭子”。這種關係形成方式體現出青年社交從“身份連接”向“興趣連接”的變化。搭子社交通過基於興趣和特定需求的臨時社交方式滿足青年陪伴需求，其特點在於邊界清晰、目標明確^[3]。

這種轉變實際上擴大了青年的社交可能性。在傳統關係中，人與人的連接往往受到現實環境限制，而搭子模式突破了固定圈層，使青年能夠主動尋找符合自身需求的人。例如，一個剛進入陌生城市工作的青年，可能很難迅速建立穩定朋友圈，但通過網絡尋找健身搭子、電影搭子，可以較快進入新的社交場景。搭子成為青年適應新環境的一種方式。不過，興趣連接也意味著關係基礎發生變化。傳統朋友關係通常建立在長期經歷和共同記憶之上，而搭子關係更多建立在當下需求之上。當共同活動結束，關係也可能隨之減少。這種變化體現了青年關係更加靈活，同時也降低了關係持續性。

2.2 從長期綁定到情境化關係

搭子關係最明顯的特點，是關係範圍受到限定。

例如，“飯搭子”主要解決一起吃飯的問題，“旅遊搭子”主要解決旅行陪伴的問題，“運動搭子”主要提供共同鍛煉的動力。這些關係通常不會要求雙方進入彼此全部生活。這種關係模式體現出青年對於社交邊界的重視。

現代青年更加關注個人空間，希望在人際交往中保持一定自主性。搭子關係通過明確的活動範圍，讓雙方能夠獲得陪伴，同時避免過度介入。青年搭子社交體現了垂直領域精準陪伴的特點，青年希望在具體場景中獲得適合自己的陪伴，而不是建立全面綁定的人際關係^[4]。這種變化可以理解為青年對於關係成本的重新計算。傳統友誼需要持續維護，需要回應對方情緒，需要投入時間和精力。對於生活節奏較快的青年而言，這種關係維護壓力可能較大。搭子關係降低了進入門檻，也降低了退出成本。但問題在於，低成本關係雖然提高了社交效率，卻可能減少關係深入發展的機會。如果青年長期停留在情境化關係中，可能難以獲得穩定的情感支持。搭子關係並不是傳統友誼的替代品，而更像是青年關係體系中的補充形式。它解決的是特定場景中的陪伴問題，而不是所有情感需求。

2.3 從情感投入到邊界管理

搭子社交體現了青年對社交邊界的新理解。在傳統關係中，親密往往意味著更多共用。例如朋友之間會分享生活經歷，參與彼此重要事件。但搭子關係強調“適度距離”，雙方可以保持友好，卻不必承擔過高責任。這種邊界意識與青年對於個人空間的重視有關。搭子關係具有一定的發展過程，能夠滿足安全、陪伴等需求，但也存在情感支持不足的問題^[5]。這裡需要重新理解“邊界”。邊界並不一定意味著冷漠。在部分青年看來，明確邊界反而能夠降低交往壓力。當雙方清楚彼此關係定位時，反而更容易保持舒適互動。例如，兩個人約定每週一起跑步，他們並不需要頻繁詢問彼此生活，也不需要承擔傳統朋友之間的情感義務。但在共同運動過程中，雙方仍然能夠獲得陪伴感和積極情緒。這種關係體現了一種新的社交邏輯：關係不一定越深越好，而是需要符合雙方需求。當然，過度強調邊界也可能造成關係表面化。如果青年習慣將所有關係都按照功能劃分，可能逐漸降低建立深層關係的能力。搭子社交帶來的變化不是簡單的“關係變弱”，而是關聯式結構更加多元。青年需要在自由與連接之間尋找平衡。

2.4 從單一社交網絡到多元關係組合

過去，人們的人際網絡相對集中，一個核心朋友圈可能承擔大部分社交功能。而搭子社交使青年關係網絡更加分散。青年可以根據不同需求建立多個小型關係網絡。例如，工作中有同事關係，生活中有飯搭子，興趣領域有運動搭子，網絡社區中還有興趣群體。劉航認為，現代青年通過搭子關係在碎片化生活中重新組織社會連接，通過多個不同搭子關係形成新的社交組合。這種多元關聯式結構提高了青年適應環境的能力。當一個青年進入新的城市時，他不必等待長期朋友關係自然形成，而可以通過不同搭子快速建立社會聯繫。這對於城市青年尤其重要。城市生活具有高度流動性。很多青年離開原有家庭和熟人環境，在新的空間中重新建立社會網絡。搭子關係提供了一種低壓力的融入方式。但是，多元化關係也帶來新的問題。如果關係數量增加，但深度不足，青年可能出現“連接很多，卻缺少真正支持”的狀態。搭子社交反映出的不是青年不需要關係，而是青年對於關係類型進行了重新劃分。

3 青年“搭子”社交背後的情感需求

搭子社交能夠快速流行，根本原因在於它回應了青年群體的情感需求。表面來看，搭子是一種功能性關係，但實際上其中包含陪伴需求、身份認同需求、安全需求以及自我表達需求。如果只將搭子理解為“工具關係”，容易忽視青年選擇這種方式背後的心理原因。

3.1 陪伴需求：緩解城市生活中的孤獨感

現代青年經常處於獨立生活狀態。進入大學、就業或者異地發展後，原有熟人關係逐漸減少，新的關係需要重新建立。這種環境容易產生孤獨感。搭子首先提供的是一種“有人同行”的感覺。例如，一個人在城市中生活，可能並不缺少網絡交流，但在吃飯、運動、旅行等具體場景中仍然需要現實陪伴。搭子正好填補了這種日常陪伴缺口。搭子社交反映了個體化社會中青年面對連接困境時形成的策略性選擇，它不是簡單的社交退化，而是一種適應現代生活環境的連接方式^[6]。這說明青年尋找搭子，本質上仍然是在尋找人與人的聯繫。不同的是，

他們更希望這種聯繫保持輕鬆和可控制。

3.2 情緒需求：尋找低壓力的情感支持

青年選擇搭子，並不只是為了完成某件事情。例如，飯搭子雖然核心活動是吃飯，但很多青年真正需要的是吃飯過程中的交流。運動搭子不僅提供鍛煉夥伴，也能夠提供堅持運動時的心理鼓勵。因此，搭子關係具有一定情緒價值。與傳統親密關係相比，搭子提供的情緒支持可能更加輕量，但並不意味著沒有價值。青年可能不希望向朋友傾訴所有壓力，卻願意與一個興趣相近的人分享某些生活感受。這種有限度的情緒交流，使青年獲得心理調節。搭子成為一種“輕量陪伴”。它不承擔完整情感責任，卻能夠提供階段性的心理支持。

3.3 身份認同需求：在興趣圈層中尋找自我定位

青年搭子社交不僅解決“和誰一起做某件事”的問題，也承擔著身份表達和群體歸屬的功能。現代青年生活在高度分化的社會環境中，個體身份不再主要依靠家庭背景、職業身份等傳統因素形成，興趣愛好、生活方式和消費選擇逐漸成為自我表達的重要方式。

例如，一個喜歡攝影的青年會尋找攝影搭子，一個熱愛戶外運動的青年會尋找徒步搭子。這些關係並不僅僅是活動合作，更是一種身份確認。通過與具有相似興趣的人建立聯繫，青年能夠獲得“我屬於某個群體”的感覺。搭子關係中的互動過程包含自我展示和群體認同等內容，青年會通過關係建立確認自身興趣和價值表達^[7]。這一特點說明，搭子社交雖然表面上強調功能，但其背後仍然存在情感和文化意義。過去，人們通常通過長期朋友關係獲得身份認同，而現在青年可以通過興趣圈層獲得新的歸屬感。搭子成為進入某種生活方式的重要入口。例如，一名剛開始跑步的青年，可能因為尋找跑步搭子進入運動群體。在共同運動過程中，他不僅獲得鍛煉夥伴，也逐漸形成“跑步愛好者”的身份認同。這種身份形成具有較強的主動性。青年不再只是被動進入已有關係，而是在網絡環境中主動尋找符合自身興趣的群體。但需要注意的是，興趣圈層也可能形成新的隔離。如果青年過度依賴相似性連接，只與具有

相同興趣的人交流，可能減少接觸不同觀點的機會。搭子社交中的身份認同具有雙重作用。一方面，它增強青年歸屬感；另一方面，也需要避免圈層封閉。

3.4 自我表達需求：尋找更加自由的關係空間

搭子社交還滿足了青年進行自我表達的需要。傳統關係中，個體往往需要維持某種穩定形象。例如，在家庭關係中需要承擔家庭角色，在工作關係中需要保持職業形象。在這些關係中，個體的表達受到一定限制。相比之下，搭子關係由於關係基礎較輕，青年可以更加自由地展示自己的興趣和生活狀態。青年會借助搭子關係展示自身興趣、生活方式和個體特徵，通過互動完成自我表達^[8]。例如，一個平時較為內向的青年，可能不願意主動加入大型社交活動，但願意通過尋找遊戲搭子、閱讀搭子等方式進入小範圍互動。這種關係減少了傳統社交中的壓力。青年不需要快速證明自己，也不需要承擔複雜的人情義務，而是在較為平等的基礎上展開交流。這也是搭子社交受到歡迎的重要原因。它提供了一種介於陌生人與朋友之間的關係狀態。雙方保持一定距離，但又能夠產生真實互動。這種關係符合部分青年對於現代社交的期待：既希望與他人連接，又希望保持獨立。

4 青年“搭子”社交中的現實問題

搭子社交滿足了青年新的情感需求，但其自身特點也帶來了一些問題。如果說傳統關係的問題在於關係負擔較重，那麼搭子關係的問題則可能表現為關係持續性不足。青年通過搭子獲得便利和陪伴，但也可能面臨情感支持不足、關係穩定性下降等困境。

4.1 關係功能化導致情感深度不足

搭子關係最大的特點是目標明確。這種特點提高了社交效率，但也容易使關係被過度功能化。當人與人的聯繫主要圍繞某種需求建立時，個體可能更多關注對方是否符合當前需要，而較少關注對方作為完整個體的情感狀態。例如，旅遊搭子可能因為旅行結束後減少聯繫，學習搭子可能因為考試結束後失去互動。這種現象並不代表雙方缺乏善意，而是說明關係建立基礎發生變化。平臺邏輯和演算法環境可能

使搭子社交呈現出交往模式、交往邏輯和交往體驗的變化，人與人的互動容易被簡化為表層連接^[9]。這一問題提醒我們，搭子關係雖然方便，但不能完全替代深層關係。人的情感需求不僅包括陪伴，也包括理解、支持和長期信任。如果青年長期依賴功能型關係，可能出現“社交數量增加，但情感獲得減少”的情況。

4.2 關係流動性增強帶來的不穩定感

搭子關係通常具有較強流動性。雙方可以快速建立聯繫，也可以快速結束關係。這種特點符合青年生活變化快的特點，但也可能降低關係安全感。傳統朋友關係需要較長時間積累，因此即使短期沒有聯繫，關係仍然可能保持。而搭子關係如果缺少共同活動，就容易自然消失。搭子社交是一種建立在數字媒介環境中的陌生人互動關係，其互動過程具有明顯的新型特徵^[10]。這種陌生人屬性提高了青年認識新人的機會，但也增加了關係維護難度。對於部分青年而言，他們可能習慣不斷尋找新的搭子，卻缺少經營長期關係的能力。這種狀態容易形成一種迴圈：需要陪伴——尋找搭子——獲得短暫滿足——關係結束——再次尋找新的搭子。如果這種迴圈持續存在，可能強化青年對於短期連接的依賴。

4.3 平臺環境中的信任與安全問題

搭子社交大量依靠網絡平臺完成。平臺降低了尋找關係的成本，但同時也增加了信息真實性和安全風險。由於雙方通常缺少共同社會關係，彼此瞭解程度有限，在建立聯繫時主要依靠個人介紹、興趣標籤和線上交流判斷。感知價值、網絡人際信任等因素會影響青年參與搭子社交的意願^[11]。這說明信任是搭子關係形成的重要基礎。如果平臺缺少有效管理，可能出現虛假信息、人身安全風險以及消費欺詐等問題。例如，旅遊搭子涉及共同出行，活動搭子涉及現實接觸，如果雙方信息存在較大差異，就可能產生風險。搭子社交的發展不能只關注匹配效率，也需要關注安全機制。

4.4 淺層社交習慣影響深度關係建立

搭子社交強調輕鬆和低壓力，這符合部分青年需求，但也可能影響青年發展深層關係的能力。深度關係需要投入時間，需要經歷共同

事件，也需要處理矛盾和差異。如果青年習慣所有關係都保持低投入狀態，可能逐漸回避建立更複雜的人際聯繫。“社恐”與“搭子”體現了青年在社交壓力和歸屬需求之間的矛盾，青年既希望避免傳統社交負擔，又希望獲得群體連接^[12]。這一現象說明，搭子並不能完全解決青年孤獨問題。它能夠提供陪伴，但無法完全替代長期關係中的信任積累。青年真正需要的並不是取消所有壓力的關係，而是在不同關係類型之間找到平衡。

5 青年“搭子”社交的合理發展路徑

搭子社交作為青年新的關係實踐，不應被簡單評價為積極或消極現象。它既反映青年社交方式的創新，也暴露出現代關係中的一些問題。更合理的方向，是在保留搭子社交優勢的基礎上，引導其向更加健康的關係模式發展。

5.1 正確理解搭子關係的價值

社會對於搭子社交的評價，需要避免簡單化。部分觀點認為搭子代表年輕人關係冷漠，但這種判斷忽視了青年真實生活環境。青年選擇搭子，並不意味著拒絕朋友關係，而是在尋找更加適合當前生活節奏的連接方式。搭子社交以精準陪伴和互不打擾為特點，體現了青年社交趨勢的變化，同時也需要關注其中可能產生的問題^[13]。應當承認搭子關係存在合理價值。它降低青年進入社交環境的難度，也幫助一些處於陌生環境中的青年獲得支持。

5.2 青年需要建立多層次的人際關係結構

搭子社交的發展，並不是要求青年回到過去單一穩定的人際模式，而是在不同關係類型之間形成更加合理的組合。人的社交需求具有多層次特點。部分需求可以通過輕量關係滿足，例如日常陪伴、興趣交流和活動參與；部分需求則需要長期關係提供，例如情感支持、價值認同和人生陪伴。如果將所有關係都轉化為搭子關係，容易使社交陷入過度功能化。但如果完全排斥搭子關係，也無法回應青年現實生活中的需求。青年需要認識到不同關係具有不同價值。例如，運動搭子可以幫助個體保持運動

習慣，旅行搭子可以豐富生活體驗，而長期朋友則可以提供更加穩定的情感支持。不同關係之間並不存在簡單替代關係，而是共同構成青年社會交往網絡。梁丹指出，青年搭子社交體現的是特定情感需求下形成的精準陪伴模式，其發展需要避免淺社交化、圈層封閉等問題。這意味著，搭子關係可以作為青年建立社會連接的入口，但不應成為青年社交的唯一形式。青年可以從搭子關係開始，通過共同活動增加瞭解，在相處過程中逐漸形成更加穩定的關係。例如，兩個人最初因為跑步成為運動搭子，在長期共同訓練中形成朋友關係。這種關係轉化說明，搭子並不必然停留在淺層，它也可能成為深層關係形成的起點。

5.3 社交平臺需要提升連接品質而非只追求匹配效率

平臺是搭子社交的重要推動力量。社交平臺通過興趣標籤、演算法推薦、地理位置匹配等方式，提高了青年尋找搭子的效率。但如果平臺只關注用戶連接數量，而忽視關係品質，可能強化關係的短期化和工具化。楊鑫指出，搭子社交以數字媒介為重要場域，在帶來便利的同時，也可能產生信息繭房、社交圈層固化以及社交風險等問題，需要加強媒介參與和規範引導^[14]。平臺可以從幾個方面改善搭子社交環境。平臺可以完善身份認證和安全機制，提高使用者信息可信度。搭子關係雖然強調輕量化，但涉及現實接觸時，安全問題不能被忽視。平臺也可以優化推薦邏輯。當前很多平臺更加關注快速匹配，而未來可以增加興趣深度、價值觀傾向等信息，使匹配不僅基於表面需求，也關注互動可能性。此外，平臺還需要承擔一定的社會責任。搭子社交並不是普通的信息交換，而是一種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建立過程。平臺設計會影響青年對於社交方式的理解。如果平臺不斷強化“快速找到”“快速替換”的邏輯，容易讓青年形成消費式社交習慣。相反，如果平臺鼓勵真實交流和持續互動，則可能促進更加健康的關係形成。

參考文獻：

[1] 謝世堅, 張麗媛. 認知社會語言學視域下網絡熱詞“xx 搭子”研究 [J]. 華南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2025(1): 131-140+207.

5.4 社會應創造更多現實交往空間

搭子社交流行的重要原因之一，是現實社會中青年交往空間不足。很多青年進入城市後，面臨工作壓力大、生活圈有限等問題。即使他們希望認識新朋友，也缺少自然交流機會。

青年社交問題不能完全依靠網絡平臺解決。社區、學校、單位等社會空間可以提供更多低壓力的交流場景。例如，社區可以組織興趣活動，學校可以建設學生社團，單位可以開展非正式交流活動。這些現實空間能夠幫助青年形成更加穩定的人際聯繫。許亨洪、伍玥認為，青年搭子社交體現了數位技術、社交平臺和青年心理需求共同作用的結果，需要通過心理調適、擴大交往空間等方式促進青年形成更加健康的社交模式^[15]。這說明，搭子社交並不是簡單的個人選擇問題，而與社會環境有關。如果青年擁有更多現實交往機會，他們可以在更多關係類型之間進行選擇，而不是過度依賴網絡尋找陪伴。

6 結論

青年“搭子”社交的出現，是社會環境變化、數字媒介發展以及青年情感需求變化共同作用的結果。它反映出青年對於人際關係的新理解：關係不一定需要高度綁定，而可以根據不同生活場景形成更加靈活的連接。搭子社交並不能簡單歸結為青年社交能力下降或人際關係冷漠。它更多體現了青年面對現代生活壓力時，對社交方式進行調整的一種主動選擇。青年通過搭子關係獲得陪伴、降低社交壓力，也在興趣互動中尋找身份認同和情感支持。與此同時，搭子關係具有明顯的功能屬性和流動特點。如果過度依賴這種關係，可能導致情感支持不足、深層關係減少以及社交能力弱化。搭子社交的發展方向並不是取代傳統關係，而是在輕量連接和深度關係之間形成平衡。

- [2] 劉航. 現代性視域下當代青年的碎片化社交行動研究——以“找搭子”為例 [J]. 中國青年研究, 2023(11): 5-14.
- [3] 劉森林, 陶靜. 當代青年搭子社交行為及其形成機制研究 [J]. 青少年研究與實踐, 2025, 40(2): 89-98.
- [4] 梁丹. 垂直領域的精准陪伴：青年新型社交樣態的敘事圖景和引導路徑 [J]. 中國青年研究, 2024(1): 94-101+119.
- [5] 莊月. 社會滲透理論視角下大學生“搭子”社交的行為樣態與引導策略 [J]. 常州信息職業技術學院學報, 2025, 24(6): 76-81.
- [6] 姜金燕. 個體化時代的連接困境與策略性社交：青年“搭子”現象的傳播學考察 [D]. 東北財經大學, 2025.
- [7] 張貞. 人際傳播視角下“搭子式”社交中的身份認同研究 [D]. 中南財經政法大學, 2024.
- [8] 鐘欣悅. 青年群體搭子社交的自我呈現研究 [D]. 東華大學, 2025.
- [9] 任雪晴. 異化理論視域下當代青年的“搭子社交”研究 [J]. 新聞知識, 2025(6): 84-91+96.
- [10] 王博文. “搭子社交”：社交媒體時代青年群體新型陌生人社交關係人際互動過程研究 [D]. 重慶大學, 2025.
- [11] 李妍妍. 青年網民搭子社交行為意願的影響因素研究：感知價值的仲介作用和網絡人際信任的調節作用 [D]. 蘇州大學, 2025.
- [12] 曹清燕. 當代青年社交模式的調適路徑——基於對網絡熱詞“社恐”和“搭子”的分析 [J]. 國家治理, 2025(5): 30-36.
- [13] 王昕迪, 胡鵬輝. 搭子社交：當代社會青年新型社交趨勢與形成邏輯 [J]. 中國青年研究, 2023(8): 90-95+119.
- [14] 楊鑫. 青年“搭子社交”現象：緣何流行、風險審視與應對策略 [J]. 思想理論教育, 2024(2): 106-111.
- [15] 許亨洪, 伍玥. 青年社交“搭子”的樣態、成因及其引導路徑 [J]. 思想理論教育, 2024(10): 92-98.

版權聲明

© 2026 作者版權所有。本文依據“知識共享署名 4.0 國際許可協議”（CC BY 4.0）以開放獲取方式發布。該許可允許使用者在任何媒介中自由使用、複製、傳播與改編文章（含商業用途），惟須明確署名原作者及出處，並注明所作修改（如有）。完整協議詳見：<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deed.zh-hans>

出版聲明

所有出版物中的陳述、觀點及資料僅代表作者及供稿者個人立場，與 Brilliance Publishing Limited 及/或編輯人員無關。Brilliance Publishing Limited 及/或編輯人員對因內容所提及的任何理念、方法、說明或產品所導致的人身或財產損害概不負責。